



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0

调查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

2017年9月5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大会关于调查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SE-BDY 号飞机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的第 71/260 号决议。

按照该决议第 1 段，我任命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任命的 2015 年独立专家小组前组长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为知名人士，负责审查可能存在的新信息，包括会员国可能提供的信息，以评估其证明价值；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包括独立专家小组(见 A/70/132)和 2013 年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见 A/68/800 和 Add.1)所做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我将根据第 71/260 号决议第 5 段的要求报告取得的进展。谨随函附上知名人士的报告，其中包括执行摘要和附件，并附上他的送文函。

我要衷心感谢知名人士的出色工作，包括审查和分析从会员国、联合国和个人收到的大量信息。他的报告是我们为履行查明真相这一共同责任而采取的又一重要步骤。

知名人士在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不是在飞机降落后被刺杀的，所有乘客都是因坠机过程中受到创伤在瞬间或不久后死亡。

知名人士认为，有可能是外来袭击或威胁导致了飞机坠毁。在这方面，知名人士认为，有充分的目击者证据倾向于确认，在 SE-BDY 号接近恩多拉时，空中有不止有一架飞机，在 SE-BDY 之外出现的任何其他飞机为喷气式飞机，SE-BDY 号在触地前起火。SE-BDY 飞机可能遭到射击或以其他方式被一架或多架其他飞机进犯。



在这方面，知名人士考虑了有关加丹加部队空袭能力的新信息，以及两个人给出的关于他们知道 SE-BDY 可能是因遇袭而坠毁的说法。知名人士指出，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坠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包括疲劳在内的人的因素可能对坠机起了作用。最后，知名人士认为，目前不可能断定飞机是否因遭到人为破坏而坠毁。他指出，无法获取关于 SE-BDY 号飞机上被放置了炸弹导致坠机这一假说牵涉到的“Celeste 行动”的原始文件。

我感谢会员国配合知名人士的工作，愿意提供更多资料。我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尚未回应知名人士的请求，其他一些会员国还可以提供更多资料。按照知名人士的建议，我请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与会员国接触，跟进知名人士提出但尚未得到满足的索要资料请求，收取其他来源提供的任何新的补充资料，并向我通报事态发展。

我打算向大会报告收到的任何信息，包括报告新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知名人士或独立小组已经评估的信息的证明价值。展望未来，大会不妨考虑知名人士的建议，即授权一名或多名独立人士持续接收、整理和评估新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送秘书长，以便秘书长随时向大会通报事态发展。

我注意到知名人士的结论，即为了最终查明真相，有必要开展进一步问询或调查，“提供给联合国的现有资料，不足以就坠机原因得出结论，似乎有可能存在更多重要资料”。我还注意到他的相关结论，即“举证责任现已转移到会员国，它们需证明已对其保管或拥有的记录和档案，包括仍然保密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以找出可能的相关资料”。因此，我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相关会员国指定一名独立的高级官员对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特别是审查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其中是否有相关资料。

指定这些官员后，法律顾问准备与他们接触，接收任何相关资料。我将报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供会员国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审议。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知名人士评估认为，除了他已联系的会员国外，其他会员国可能也掌握相关信息。我鼓励可能掌握相关信息的所有会员国进行上述全面审查，以提供相关信息。

联合国先前已将可能与坠机有关的大量记录解密。根据知名人士新的查证线索和他的建议，联合国已开始对与坠机时间有关的联合国刚果行动的记录进行解密。

根据大会第 71/260 号决议第 4 段，我谨告知大会，联合国继续与各类国家档案和私人持有的档案保持联系，以探讨建立一个中央档案存放处或作出其他整体安排的可行性，使得能够以电子方式或其他适当途径查阅这些记录和联合国档案，确保对其进行持续、更好的保管和查阅。

查证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与情况的全部真相仍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认为这是我们对我的杰出、卓越的前任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和家人履行的一个庄严义务。

我呼吁大会继续处理此案，并认可知名人士的报告和他的建议，以确保全面查阅相关资料并查明真相。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送文函

2017年7月24日根据大会第71/260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作为根据大会第71/260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提交报告，说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以及我的主要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在本信之后是我的报告执行摘要，作为报告介绍应与报告一并阅读。

遵照你发布的职权范围，我于2017年3月开始工作。在大会第69/246号决议设立的独立专家小组2015年工作的基础上，我请八个会员国和联合国在独立小组确定的关键主题领域进行有重点的资料搜寻。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坠机发生的相关背景，并找到潜在的新的相关信息。我审查了这些搜寻工作产生的大量新资料，以及个别研究人员提供的大量信息。在确定每条新信息的相关性、真实性、可信性和可靠性之后，我对其证明价值做了评估，将其划归为无、弱、中和强四等。

对相关总体情况的了解有所增加，尤其是在会员国是否可能截获联合国通讯以及加丹加武装部队是否有能力袭击秘书长飞机这两个方面。我已能得出一些结论，在此提供给你审查。也可确定将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作为可能的信息来源，以找到更多新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寻求真相可能具有极大价值。现有的工作远未接近我们掌握情况的可能极限，因为我们探究得越深，发现的相关信息越多。

我在报告中提出三条相互兼容、相辅相成的建议，旨在请大会、会员国和联合国采取多种行动，加快寻找真相。这些建议不妨碍阁下作为秘书长的特权以及大会的最终决定，它们涉及对目前调查工作未完成的各个方面采取后续行动，请有关会员国各自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并探讨联合国可否审查自己的具体记录和档案，以便进行可能的解密。

我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承担这项任务是我的殊荣。我感谢联合国、特别是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及档案和记录管理科的支持。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是在极大的时间压力下，向我提供了专业咨询和协助。我还要感谢我的助理西蒙·托马斯的出色支持。

我要对会员国的合作表示深深的谢意，特别感谢它们在迫不得已的短时间内进行广泛的信息搜寻。总的来说，这一进程似乎更加透明，我感谢会员国政府根据大会第69/246号决议，努力寻找与已故秘书长及其随行人员罹难有关的资料。我还想表明，我无意在报告中专门针对任何会员国发难，但可以注意到，我在分析收到的新资料时，必然会频繁提到那些提供合作最多的政府，因为他们往往是这些新资料的来源。

我要感谢各位专家无偿、慷慨地提供他们的专业知识。我要特别感谢 Mandy Banton、George Bizos、Hans Corell、Raoul da Costa 上校、Elisabeth de Kemoularia、Jan Eliasson、Stewart Fleming、Torben Glstorff、Sven Hammarberg、Ake Hassler 博士、David Lea of Crondall 勋爵、Jonathan Marks of Henley-on-Thames 勋爵、John Monks 勋爵、Michael S. Pollanen、Hans Kristian Simensen、Stephen Sedley 爵士、Christelle Terreblanche、David Wardrop 和其他不希望被提到名字的人。我必须专门感谢苏珊·威廉姆斯博士做出的非常杰出的贡献。

最后，我再次向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在执行联合国公务时罹难人员的亲属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为了他们，我们应继续致力查明在那厄运降临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真相。

知名人士

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签名)

执行摘要

引言

1. 1961年9月17日至18日夜晚，载有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一架注册号为SE-BDY的DC-6型包机于午夜刚过时属于当时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附近坠毁。哈马舍尔德及其15名随行人员中的14人当场死亡，唯一的幸存者六天后死于创伤。新兴的联合国失去了第二任秘书长(他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和另外15名为刚果和平任务尽职尽责奉献的男女工作人员。

2. 在坠机发生后的56年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有关坠机原因的各种假设，包括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外来袭击或威胁”)、人为破坏、劫持和人为错误。迄今，调查尚未得出定论。继1961年的两次罗得西亚调查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确定，它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为解释坠机原因提出的任何一种假设。因此，大会在1962年决定将这一事项留待进一步审议，请秘书长向其通报可能出现的任何新证据。2013年，由四名知名法学家组成的私营志愿机构“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工作促成大会于2015年设立了一个独立专家小组，审查和评估有关这一死难事件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虽然独立小组有效排除了一些理论，但最终建议需要进一步查证或调查。为此，我在2017年被任命为知名人士。

本调查涉及的领域

3. 根据大会第71/260号决议，我作为知名人士的任务范围与独立小组的一样，包括审查关于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潜在新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还包括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的范围，如有可能，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4. 大会第69/246和71/260号决议鼓励会员国公布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据此，我于2017年4月和5月向八个会员国、联合国和某些个人发出了就相关具体领域索取资料的请求。根据现有信息，确定以下会员国最有可能掌握相关资料：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不过，鉴于1960年代非洲的非殖民化和地缘政治进程，以及当时会员国对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的支持，其他会员国可能也掌握相关资料。

5. 独立小组的结论认为，新目击者证词、据称截获有关坠机的通讯以及有关加丹加武装部队空中能力的新资料可能提供了“相当多的线索”。在此基础上，我请求着重搜寻以下类别(非全部类别)的资料，这可能与1961年刚果加丹加省内及周围局势有关：(a) 截获有关坠机或相关事件的通讯；(b) 加丹加武装部队包括其空军的能力；(c) 外国军队、准军事部队或非正规(包括雇佣军)部队和(或)人员的存在；(d) 外国情报机构或人员的存在；(e) 对联刚行动的攻击；(f) 与加丹加省政府的情报、安全、技术和(或)政治合作。

新资料

6. 比利时、加拿大、德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对我提出的资料搜寻请求作出了回应，我感谢它们的协助。搜寻工作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新信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搜寻的程度越深，发现的相关信息越多。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认定，进一步搜寻有可能找出更多相关资料。根据独立小组确定的存在相当多线索的领域，我收到了有关截获通讯以及 1961 年时加丹加武装部队能力的大量新资料，本报告尤其得益于这些资料。下文简要概述这些资料。

截获通讯

7. 独立小组审议了两名美国军官的报告，他们分别声称读到或听到了有关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 SE-BDY 号遇袭的信息传输。其中一人是海军司令 Charles Southall，他 2015 年不幸去世。美国先前确认了他的服役记录。另一人是美国空军安全局军官 Paul Abram。不过，美国在 2017 年 7 月才确认他的服役记录，同时还提供了新资料，对他声称听到截获情报时所在的地点提出异议。虽然我在结束工作前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既然美国已确认 Abram 是其安全部门的一名前成员，应该有可能对他的说法进行全面调查。

8. 另外，我还收到联合王国、美国、联合国和个人提供的新资料，似乎证明罗得西亚当局和联合王国当局 1961 年在刚果截获了联合国的通讯。此外，我第一次得到美国确认，空难发生的夜晚，在恩多拉及其周边存在美国的军事资产，包括一至三架 Dakota 飞机。这些飞机配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可以长距离包括在洲际间拦截、传输和接收通讯。我还很感谢收到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供的资料，似乎首次(就这一事项而言)正式确认在相关时间在刚果境内及周围存在他们的情报、安全和国防特工人员。虽然这些资料本身并不能直接帮助确定坠机的可能原因，但它们强烈表明，在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可能存在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可能与坠机原因有关的资料。

可能的外来袭击或威胁，包括加丹加武装部队的能力

9. 外来袭击或威胁的假设包括一种理论，即飞机可能遇到加丹加部队操作的一架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的袭击、威胁或干扰。在考查这些部队的能力时，1961/62 年的调查似乎认为，在相关时间，加丹加只有一架可运行的 Fouga，只有一名飞行员能够驾驶该飞机。新资料否定了这一看法。关于 Fouga 喷气式飞机的存在，独立小组审查了经美国确认为前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官员的 David Doyle 的说法。他声称 1961 年，在“中情局协助”下，“法国人”提供了三架 Fouga 飞机。美国在 2015 年时告知它不知道向加丹加交付 Fouga 喷气式飞机一事，但 2017 年，美国和其他来源提供的信息似乎证实，大约在 1961 年 2 月 16 日，一家美国商业航空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对，将购自法国的三架 Fouga 喷气式飞机运到加丹加。我评估认定这一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强”。

10. 此外，从美国和联合国收到的新资料表明，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在加丹加周围至少有两架 Fouga 喷气式飞机可以运行。对此仍需查证更多事实后才能最后确定。我还收到美国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相关时间，可能使用了一架

Fouga 飞机在加丹加实施空对空袭击，包括袭击美国飞机，这无疑引起了美国国防机构的关注。收到的其他资料提到有 Fouga 喷气式飞机在夜间飞行或是在加丹加未铺路面的简易机场起飞，这两点均表明那里的飞行员有能力操纵该喷气式飞机执行超出其正常能力范围的行动。

11. 关于在加丹加是否能得到和使用其他类型的飞机，独立小组审查的资料表明，加丹加可能也能获得 De Havilland Dove 和 Dornier DO-27/DO-28 型飞机。2017 年，我还收到德国和一名研究人员提供的资料，强烈表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之前，至少有一架 Dornier DO-28 似乎按商业条件从西德提供给了加丹加，该飞机可能经过了改装，以便白天和夜晚都能进行空中袭击和轰炸。我不能排除那天夜晚空中有另一架非加丹加飞机的可能性。如果联合王国移交过去的北罗得西亚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其中可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资料。

12. 我还收到美国和联合国提供的资料，表明在相关时间，加丹加省内及周边的机场数目可能比最初了解到的更多，加丹加部队显然不只使用加丹加省内的机场。秘书处外勤支助部地理空间信息科大力协助绘制了地图，我将它附在报告之后，以直观展示这一信息。

13. 我还收到资料显示，一名比利时飞行员“Beukels”1967 年曾对 Claude de Kemoularia 宣称，他击落了 SE-BDY 或以其他方式迫使其坠毁，但这一说法未得到证实。在工作过程中，我第一次获准查阅 De Kemoularia 的记事本原件以及他的许多个人记录，似乎证实他在 1967 年会见了“Beukels”和其他雇佣兵。我还查阅了 De Kemoularia 的信，表明他在比先前理解的早得多的时间就向法国和瑞典当局报告了 Beukels 宣称的内容。然而，由于没有进一步资料，我无法核实 Beukels 所述内容的其他方面，最主要的是无法核实“Beukels”的身份。

可能的人为破坏

14. 有一种理论认为，为实施“除掉”哈马舍尔德的阴谋，在 SE-BDY 上放置了一枚炸弹，飞机降落前炸弹被引爆，导致坠机。为评估这一假设，我尝试征求南非许可以查阅这一说法涉及到的“Celeste 行动”文件。虽然大会为对相关文件进行法证检查提供了经费，我也商妥了由一名著名专家进行这一分析的职权范围，在撰写本报告之时尚未获准查阅这些文件。

人为错误

15. 我收到新资料指称，机组人员使用酒精或毒品可能对空难事件产生了因果影响。但是，根据最初的医疗报告，包括其中的毒理分析结果，以及我在 2017 年征询的独立专家意见，没有证据证实这一指控。

其他相关事项

16. 对以下方面的新资料进行了评估：前秘书长在 1961 年 9 月启程前往恩多拉之前要求从埃塞俄比亚向刚果部署喷气式战斗机，旨在打击 Fouga 飞机对刚果行动的空中袭击，但部署延迟；据称联合王国对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施加了影响；证

人在早期调查时所做的各种陈述之间以及各国政府的官方记录之间存在差距。我认为不能认定这些新资料意味着就这一死难事件存在掩盖事实或阴谋串通行为。

结论和建议

17. 我的报告无意评判早些时候的正式调查，但我认为可以确定的是，1961/62年的调查虽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对当地目击者的证据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失去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机会。最近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力求听取来自仍在世的当地目击者的更多证据。早期调查对当地目击者的证据重视不足以及对空难的唯一(即使是短暂)幸存者 Harold Julien 所提供证据的价值普遍低估，可能导致早些时候没能穷尽考虑各种可能假设，特别是考虑外来袭击或威胁是否是坠机的可能原因。

18. 根据手头已有的全部资料，似乎有理由认为外来袭击或威胁可能是坠机的一个原因，无论是通过直接袭击还是通过对飞行员的短暂干扰导致 SE-BDY 坠机。这种干扰只需在飞机下降的关键时刻使飞行员的注意力转移几秒钟，就可能造成致命后果。目击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看到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另一架可能是喷气式飞机，SE-BDY 坠毁前起火，而且(或者)SE-BDY 遭到枪击或被另一架飞机以其他方式进犯。整体来看，这一证据不易被否定。

19. 有理论认为，可能出现了机械或其他重大故障，包括高度表出问题，给出的设定高度有误，或者使用了错误的着陆图。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均已被充分否定。当然仍然可以设想坠机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尽管机组人员经验丰富，飞机接近着陆前条件正常。然而，在做出这一结论前，必须确信对所有潜在证据都进行了审查。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会员国尚未充分查找他们可能持有的所有相关资料，这本身就成为这一事项的一个相关重大事实。结合上文讨论的关于可能存在于外来袭击或威胁的证据，可以看出，要对这一事项做详尽无遗的审查，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工作。当务之急是可能掌握相关信息的所有会员国全面审查其情报、安全、国防和其他记录，披露或至少证实存在任何相关材料；如果不存在这种相关材料，应就此做出清楚明确的声明。

20. 鉴于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查证事实和(或)征求专家意见，我在既定时间内未能完成所有方面的工作。因此，我的第一项建议是，秘书长和(或)其指定的独立人员对本次调查具体指出的尚未完成的各个方面采取后续行动。我在报告中列出了我认为可以做到的一些工作，包括跟进要求那些尚未做出回应的会员国进一步搜寻资料。

21. 根据我在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举证责任现已转移到会员国，它们需证明已对其保管或拥有的记录和档案，包括仍然保密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以找出可能的相关资料。因此，我的第二项建议是，要求每个有关会员国指定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相关资料。主要关注领域是截获的无线电通讯和有关记录(例如，包括磁带、录音抄录、二级/三级信息及其他材料)，尤其是 SE-BDY 发出的或 SE-BDY 与任何其他飞机、地面部队和空中交通控制部门之间可能有的

通讯。有关 SE-BDY 在最后时刻发生的情况的任何资料，如果可以核实，将可能证实或否定现有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从而使我们更接近结案。

22. 为了展现联合国的榜样作用，我提出第三项建议，即本组织审查自己的具体记录和档案，确定是否可能进一步解密。这包括知名人士的记录、我的第一项建议提到的联刚行动记录以及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所有记录，确定是否可能解密。

23. 我想指出，如能授权具体人员持续接收和整理新资料以便向秘书长转递，对这一事项的处理将大有助益。我认为，一种有益的做法是，让获得授权的人员以本报告的结论为指导，不时地评估任何新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对导致这一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的了解，使秘书长能随时向大会通报这方面的事态进展。

24. 就这起空难事件的一项或多项假设可能涉及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不利或敌意行为，因此这是事关最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SE-BDY 坠毁已经过去将近 56 年，许多政府对当年曾经绝密的材料做了部分解密，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材料涉及的事件乃至世局已成过往。我们在了解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的全面真相方面取得了进展。应利用在寻求共同真相方面的现有势头，鼓励关键会员国切实参与搜寻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材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填补对这一事件的事实陈述中尚存的空白。这是必须采取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使我们对为本组织执行公务时在 SE-BDY 坠机中不幸罹难者的记忆得以安放。

大会第 71/260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13
A. 背景：以往的调查和质询.....	13
B. 任务和定义	14
C. 方法和活动	14
D. 报告的结构	16
二. 独立小组的主要调查结果概述.....	16
A. 关于独立小组调查结果的初步说明	16
B. 独立小组的主要调查结果概述.....	17
三. 扩大搜寻资料：会员国和联合国.....	17
A. 导言.....	17
B. 扩大搜寻资料请求：会员国的答复	18
C. 扩大搜寻资料请求：来自联合国的答复.....	20
D. 资料搜寻工作遇到的限制.....	21
四. 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21
A. 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	21
B. 人为破坏：Celeste 行动/南非海洋研究所.....	33
C. 人的因素	34
五. 其他新资料	35
A. 地方官员和当局的行为	35
B. 搜索和救援	37
C. 截获通讯	37
D. 其他.....	41

六. 调查结果和结论.....	42
A. 最初调查的不足之处.....	42
B. 坠机原因.....	44
C. 其他事项.....	50
七. 建议和结论.....	53
A. 建议的依据.....	53
B. 建议.....	54
附件.....	56

一. 导言

A. 背景：以往的调查和质询

1. 1961年9月19日至11月2日,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政府民用航空部调查局(罗得西亚调查局)最先正式调查了这起死难事件。随后,根据1955年《联邦调查委员会法》成立了一个联邦调查委员会(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之后,联合国大会依据第1628(XVI)号决议成立了1961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1961年委员会),对导致这起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开展国际调查。如前所述,1961年委员会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关于坠机原因的任何假设。因此,在1961年委员会的报告(A/5069)发表后,大会在第1759(XVII)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该报告,并请秘书长向其通报他可能注意到的任何新证据。

2. 2013年,私人志愿机构——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说明联合国是否有理由重新调查导致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由四个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组成,他们审查和报告了大量材料,包括个别研究人员所做的重要工作,比如2011年出版的“Who Killed Hammarskjöld? The UN, the Cold War and White Supremacy in Africa”一书的作者苏珊·威廉姆斯开展的工作。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最后认为,联合国确实有理由重启1961年委员会的调查,因为有充分证据表明有必要进一步调查飞机是否因遭遇某种形式的敌对行动而迫降。

3. 2014年3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大会,并附上一份说明,表示他的评估意见是,该报告载有新证据(A/68/800和Add.1)。根据该报告和秘书长的评估意见,大会于201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69/246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任命一个独立专家小组,以审查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大会在该决议中还鼓励会员国向秘书长公布和提供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

4. 2015年3月16日,秘书长宣布,依照大会要求他任命了独立专家小组(独立小组),其任务是审查新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他任命当时担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的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为独立小组组长,并任命航空安全专家Kerryn Macaulay(澳大利亚)和弹道学专家Henrik Larsen(丹麦)为小组成员。独立小组工作了大约10个星期,于2015年6月12日向秘书长提交报告。下文第二节将进一步讨论独立小组的调查结果。收到独立小组的报告后,秘书长必须跟进落实独立小组向会员国提出的、在其提交报告之时尚未得到答复的某些索要资料请求。他做了跟进,并于2016年8月16日向大会提交报告(见A/70/1017)。在审议了秘书长的说明后,大会于2016年12月23日通过第71/260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请秘书长任命一名知名人士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B. 任务和定义

5. 如上所述，独立小组的任务是审查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有关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具体而言，独立小组的任务是：审查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和源材料、会员国公布的任何有关记录或是会员国或其他来源可能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约谈证人和提供了新资料的其他人士以及能够鉴定这些资料或是解释其所涉技术性问题的专家；在必要时和适当情况下前往坠机现场；编写一份关于其调查结果的报告，并在其中列入独立小组约谈的证人提供的新陈述以及会员国或其他来源提供的任何新记录或新资料。独立小组按照这一任务规定于2015年完成了工作。下文将概述其主要调查结果。

6. 知名人士的工作以独立小组的工作为基础，并有所推进。根据大会第71/260号决议，知名人士的任务与独立小组的任务一样，包括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包括会员国可能提供的新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知名人士的任务还包括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关于知名人士的任务，需要做一点限定说明，即与独立小组的任务一样，它不涉及对死难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或查证。

7. 独立小组将与死难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由于其内容或出现时间，1961年委员会无法看到的资料。第二类是1961年委员会当时可以看到，但由于新材料、科技发展或最佳做法的出现，现在能够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的资料。我采取了类似的定义办法，并列入了独立小组提交报告以来的两年时间里可以看到材料。我此次的任务范围比独立小组的任务范围更广，因此，我必须根据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完成各自工作后出现的新资料，重新审查它们分析过的资料。

8. 关于“证明价值”的定义，我的处理方法与独立小组的一样，即有关资料独自或是与其他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趋向于证明或否定存在或不存在某件或某些相关事实。根据以下标准(并非全部标准)，我对每一项可能的资料进行了考量：真实性(包括前后一致性和当时性)、类型(例如主要资料、次要资料、传闻或间接资料)、可信性(包括与其他资料或已核实情况的一致性)、专家技术评估结论以及有关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他材料的支持。

C. 方法和活动

1. 方法和活动说明

9. 为了履行任务职责，我必须审查以往历次正式调查的报告，检查和评估后来从会员国和个人获得的资料，与政府和其他资料来源协商，约谈证人包括专家证人。

10. 独立小组将其评估的每一项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归入四个类别：无、弱、中、强。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些分类，并想再一次说明，对每一项或多项资料的证明价值的评估结果不一定是静态不变的，可以发生变化，原因包括在之后的某个日期出现了其他新资料。例如，一项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或许被评定为“弱”，但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所涉及的假设已被否定。相反，评估结果针对的是某一项具体证据及其是否趋向于证明或否定有关的事实。

11. 在审查可能的新资料时，我在本报告中考虑了对关于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的任何新传闻或说法是否应予追踪查证。应当回顾指出，1961年委员会在调查事件的可能原因时也审查了各种传闻。考虑到事发距今已过多年，现有资料可能被用来故意编造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而编写本报告的最主要出发点是寻求全部真相，因此，我认为所提供的任何宣称的潜在新资料至少应有某些基础或材料依据(事实的、法律的、间接的或推断的)，这样才值得对其做进一步审查，无论这些依据的份量有多轻。这样要求并非是想拒绝接收新资料，而是要确认那些无凭无据或不着边际的说法没有真实可能性。

12. 我们对1960年代初刚果境内及周围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多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空难事件。这主要归功于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独立小组和私人研究人员近年来所做的工作。资料搜寻工作做得越多，或者公开的资料越多，出现新的和(或)相关资料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请求提供新资料和搜寻新资料的范围也必然扩大。

13. 大会第69/246和71/260号决议鼓励会员国公布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并向秘书长提供有关资料。据此，我于2017年4月和5月向以下会员国发出了索取资料的请求：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下文第三节进一步讨论这些搜寻情况。

14. 独立小组结束工作后，秘书长收到了与这一事项有关的个人来文(见A/70/1017)。收到秘书长提供的记录后，我在工作中联系了这些人，分析了从他们以及自愿提供信息的其他人那里收到的相关资料。下文第三节也将讨论收到的这些资料。

15. 在工作过程中，我在纽约会晤了多方人士，包括会员国代表、联合国秘书处代表以及一名罹难者家属代表。我还在联合王国会晤了哈马舍尔德调查信托基金主席Lea of Crondall勋爵。此外，我会见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前负责人Stephen Sedley爵士及学者和历史学家苏珊·威廉姆斯，后者2011年的著作为重振对这一事项的关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我还与一些志愿研究人员和有关各方做了信函交流。

16. 本报告的编写得到了许多个人志愿者的协助，他们向我提供了专家意见和技术评估。我非常感谢他们在极为紧迫的时间内做出的工作和贡献。在与法医学资料有关的专家评估方面，我获得了下列人士的帮助：安大略省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多伦多大学检验医学和病理学教授Michael S. Pollanen；邓迪大学法证和法医中心主任Stewart Fleming。有关飞机的专家评估，我得到以下两名前战斗机飞行员的协助：塞内加尔空军前参谋长Raoul da Costa上校(退役)；事故调查员Sven Hammarberg。

2. 制约和限制

17. 独立小组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开展工作，包括审查收到的大量材料。按照其任务规定，小组评估了提供给它的新资料并确定了它们的证明价值等级。小组还力求尽可能总结相关资料并评估其真实性和可信性。与此同时，鉴于任务量巨大，时间和资源有限，独立小组无法对资料的每一个方面进行核实。

18. 我在工作过程中，也面临着类似的时间和资源限制。此外，每项具有证明价值的新资料都有可能牵出进一步的调查线索。基于这些原因，本报告即使与之前的那些报告一并阅读，也不会自诩为关于这一事项的一部综合性专著；相反，它只是寻找全部真相进程的一部分，而在这一进程中仍不断出现新的事实陈述。至于最根本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飞机坠毁，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存在的所有相关材料。不过，根据现有全部资料，可以得出若干调查结果和某些结论，下文第六节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D. 报告的结构

19. 鉴于本报告是独立小组最近开展的进程的继续，下文第二节将简要重述小组的主要调查结果。第四节和第五节概述和评估独立小组 2015 年结束工作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收到的相关新资料的证明价值。第六节阐述本报告的调查结果和结论。第七节载有我的建议和结论意见。

20. 应当注意的是，新资料是按照小标题分类组织的，这些小标题与先前的正式调查，包括最近的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报告和独立小组报告使用的小标题大致对应。这种结构安排本身并不是对任何一种坠机原因假设的相对可能性表示认可。相反，其目的是提供一致性，以便在本报告和以往报告之间进行交叉参考，因为要适当处理这一主题事项，必须将这些报告一并阅读。

二. 独立小组的主要调查结果概述

A. 关于独立小组调查结果的初步说明

21. 独立小组评估了所获得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但是，由于其任务规定的限制，它对这些资料的证明价值的评估不是对任何一种基本假设的决定性评定。如果独立小组评估认为某种说法缺乏证明价值，它依据的是为支持这一说法提出的证据。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只是空口无凭的陈述。因此，若小组认定某种说法的证明价值为无、弱、中或强，不是指该说法是真还是假；相反，这只是基于各种因素，包括所提供的支持该说法的证据的质量做出的评定。下文概述了独立小组就其评估认为具有中等证明价值的资料以及其最初评估认为证明价值弱、但后来又收到了进一步相关信息的资料得出的主要调查结果。要全面考虑独立小组所审查的各种说法，必须参考其报告。

B. 独立小组的主要调查结果概述

22. 关于 SE-BDY 号机组人员和乘客的死因，独立小组认定，Ross 医生、Smith 医生和 Stevens 医生 1961 年所做的最初尸检的结果和结论具有充分依据。也就是说，当时的资料和新获得的资料均支持这样的结论，即所有乘客因飞机坠毁造成的多处负伤瞬间或之后不久死亡。因此，独立小组的结论认为，关于死因的其他说法，包括达格·哈马舍尔在坠机前或在坠机中生还后被刺杀的说法，缺乏证明价值。

23. 关于 SE-BDY 号最后飞行时段的资料，小组审查了目击者提供的新信息。它认为，在帮助确定关于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的一个或多个情况方面，12 名新目击证人中的 9 人提供的资料具有中等证明价值。下文将进一步介绍这些资料。在同一资料类别中，独立小组还认定 Charles Southall 和 Paul Abram 二人的说法具有中等证明价值；此二人分别说，他们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时，在事发夜晚听到或读到了截获的据其认为是有关袭击 SE-BDY 并导致其坠机的无线电话。

24. 独立小组认为，据说是南非海洋研究所下发的命令执行以“除掉”哈马舍尔德为目标的“Celeste 行动”的文件缺乏证明价值，主要原因是其真实性无法确定，文件过手链条不确定，不能证明 1961 年 9 月该研究所是否存在。2016 年，南非通知联合国它可能找到了迄今尚未见过的与该问题有关的文件，因此，获得有关这些文件的更多新资料的可能性再次出现。下文第四节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25. 关于四名机组人员中有三人在 SE-BDY 飞行前似乎没有足够机会得到适当休息的资料，独立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这一资料是在瑞典有关当局任职的合格工作人员根据 SE-BDY 的运营公司泛航公司的记录在当时进行的分析。

26. 关于北罗得西亚当局在官方所说的 1510 时之前发现了飞机残骸的新资料，独立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这一信息来自两名目击者，并与另一条信息相关，即英国驻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 1961 年 9 月 18 日 1400 时抵达索尔兹伯里时已经获悉发生了坠机。这条信息的证明价值也被评为“中”。

27. 关于声称联合国加密通讯被联合王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截获的资料，独立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该资料是哈马舍尔德访问刚果期间使用的 CX-52 型密码机的生产商、瑞士公司 Crypto AG 创始人的妻弟提供的。

三. 扩大搜寻资料：会员国和联合国

A. 导言

28. 2015 年曾要求会员国在其记录和档案中搜寻可能有助于了解这起死难事件的资料。虽然就坠机原因没有找到决定性的信息，但如上文所述，独立小组分析了具有不同等级证明价值的资料。因此，我在 2017 年请求一些会员国继续在重

点突出的一些主题领域进行搜寻。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坠机发生的相关背景，并找到潜在的新的相关信息。我还请联合国以相应方式搜查其记录和档案。

29. 我向联合国和以下八个会员国发出了进一步搜寻资料的请求：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我请求搜寻可能与 1961 年加丹加省内及周围局势有关的下列类别的资料：

- (a) 截获有关坠机或相关活动的通讯；
- (b) 加丹加省政府武装部队的的能力，包括其空军的能力；
- (c) 外国军队、准军事部队或非正规(包括雇佣军)部队和(或)人员的存在；
- (d) 外国情报机构或人员的存在；
- (e) 对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的攻击；
- (f) 与加丹加省政府在情报、安全、技术和(或)政治方面的合作；
- (g) 关于被称为 Union Minière 或 Union Minière du Haut Katanga(又简称为 UMHK)的比利时公司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事件中可能发挥作用的资料；
- (h) 有关南非海洋研究所的资料。

30. 当然，上述清单并非详尽无遗地列出了相关资料的领域，而且这些资料也并非只是在我向其发出搜寻请求的会员国才可找到。不过，基于独立小组的工作和以往的调查，我认为这些领域所代表的调查线索没有得到充分探究；或者由于我们对事件的了解增多，这些线索可能具有更大的相关性。我之所以选择请求上述国家提供协助，是因为现有记录显示，这些国家似乎最可能直接掌握相关资料。鉴于 1960 年代刚果的非殖民化和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对联合国行动的支助及其他诸多因素，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和葡萄牙等会员国以及其他方面可能也持有相关资料。

31. 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即在提出查找资料的请求时，我采用了与独立小组工作时相比不那么正式的方式与会员国通信往来，以提高沟通效率。因此，为简明起见，我没有将与会员国的往来信函附在本报告中；不过，本报告概述了相关信息。

B. 扩大搜寻资料请求：会员国的答复

1. 截至 2017 年 7 月已作出答复的会员国

比利时

32. 2017 年 5 月，我书面请求比利时政府进一步查找上文所述资料。我在其中一项请求中还指出：

我注意到去年向比利时议会提出的问题可能涉及与这一专题有关的问题。特别是，我收到一份“Question parlementaire”(附于本函)及相关答复，编号为 54-1-001548，登记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2 日，所涉主题为“Enquête des Nations Unies-Mise à disposition des archives de la Sécurité de l’Etat”。从对这

份“Question parlementaire”的答复中似乎可以看出，比利时政府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答复 2015 年独立专家小组提出的问题，可能没有查考比利时国家安全档案。如果在编写对 2015 年独立小组询问的答复时没有查找比利时安全和(或)情报实体的档案，我请求现在进行查找；如有必要，应审查以前作出的答复。关于知名人士的任务，如我 2017 年 5 月 16 日给你的信中所述，我谨请求就该信提出的进一步具体搜寻请求，也应查考比利时国家安全档案。

33. 2017 年 6 月 15 日，我收到比利时的答复连同另外 10 份文件。答复特别向我证实，已经搜查了国防和国家安全档案及外交档案(“Les services d’archives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 de l’Etat (cette dernière dépendan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ont mené une recherche dans leurs archives et ont ainsi contribué à la présente réponse. Une nouvelle recherche a été menée dans l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u Départemen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我感谢比利时进行调研、汇编搜寻结果并传送进一步资料。下文将在相关标题下讨论从比利时收到的新资料。

加拿大

34. 2017 年 5 月，我写信请加拿大搜寻上文提到的资料，并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收到答复。我感谢加拿大进行调研、汇编搜寻结果并传送进一步资料。

德国

35. 2017 年 4 月和 5 月，我在亲自会面并在随后的书面信函中，请德国进行上文提到的搜寻，并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收到答复，连同在联邦外交部(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文件专员(Bundesbeauftragter für Stasiunterlagen)和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的档案中找到的符合请求的文件清单。据指出，这些清单是可能相关的档案清单，其查阅权受德国法律规限。答复还指出，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但在我撰写本报告之时没有收到进一步资料。我感谢德国进行调研、汇编搜寻结果并传送进一步资料。下文将在相关标题下讨论德国搜寻得出的新资料。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6. 2017 年 4 月和 5 月，我在亲自会面和随后的书面信函中，请联合王国进行上述搜寻。2017 年 6 月 21 日，我获悉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档案中找到了一个相关文件的文件夹。获准在伦敦查阅了这些文件，副本被送到纽约。我感谢联合王国进行调研、汇编搜寻结果并传送进一步资料。下文将在相关标题下讨论从联合王国收到的新资料。

美利坚合众国

37. 2017 年 4 月和 5 月，我在亲自会面和随后的书面信函中，请美国进行上述搜寻。2017 年 6 月，美国向我提供了确认为符合搜寻请求的几批资料。我收到大约 1 500 份文件，其中大多数是电报和其他通信或报告。我感谢美国进行调研、汇编搜寻结果并传送进一步资料。

38. 我还请求就独立小组结束工作之后提出的若干问询做出澄清，对此我也在 2017 年 6 月收到了答复。我的问询之一是，就 2013 年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确定为当时处于保密状态的“三份符合请求的文件”，截至独立小组完成工作之时，其一名或多名成员是否已看到了全部这些文件。美国的答复是肯定的，称 2015 年时给独立小组成员 Macaulay 女士看了其中两份文件，第三份是 1961 年 9 月 18 日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现金沙萨)大使 Edmund A. Gullion 发出的一份电报，提到秘书长的飞机可能被击落了。美国还向我确认，这份电报的发送日期是 1961 年 9 月 18 日，而不是文件的一个副本上显然注明的 9 月 17 日。下文将在相关标题下讨论从美国收到的其他新资料及对我的询问作出的答复。

2. 未作出答复的会员国

法国

39. 2017 年 5 月，我写信请法国进行上述搜寻。我收到通知称已将搜寻请求送交法国有关当局，我在 2017 年 6 月又做了跟进，但截至请求答复的最后期限 2017 年 6 月 15 日或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收到回复。

俄罗斯联邦

40. 2017 年 4 月和 5 月，我在亲自会面和随后的书面信函中，请俄罗斯联邦进行上述搜寻。2017 年 5 月我收到通知称已经收到了我的请求，我在 2017 年 6 月又做了跟进，但截至请求答复的最后期限 2017 年 6 月 15 日或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收到回复。

南非

41. 2017 年 4 月和 5 月，我在亲自会面和随后的书面信函中，请南非进行上述搜寻。2017 年 5 月我收到通知称已经收到了我的请求，我在 2017 年 6 月又做了跟进，但截至请求答复的最后期限 2017 年 6 月 15 日或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收到回复。

42. 另外，我请求南非准许查阅与 Celeste 行动有关的文件。下文第四节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C. 扩大搜寻资料请求：来自联合国的答复

43. 2017 年 4 月，我请求联合国进行上文提到的资料搜寻。我还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关键词清单，请求将它们也列入搜寻范围。我从这些搜寻结果中选出我认为最具相关性的文件夹，并审查了其实物和电子版本。

44. 我不受限制地查阅了所有联合国档案，并得到了秘书处管理事务部档案和记录管理科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但是，我审查的一些档案仍属于机密或绝密的保密级别，这意味着不能将其公之于众。我在第七节中就是否有可能解密某些档案提出了建议。下文将在相关标题下讨论从联合国收到的新资料。

D. 资料搜寻工作遇到的限制

45. 必须指出，扩大后的搜寻范围也不能说是全面覆盖的。作为知名人士，我的任务受到某些限制，包括我一直是一个人 and 一名助理在工作，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研、审查各种语文的几千页材料并报告我的调查结果。有一些限制可能不太明显：例如，大多数联合国档案没有数字化，这意味着通常无法利用关键词进行全面搜索；一般只显示文件夹名称(往往很笼统)。我知道许多会员国的档案也是这样。此外，即便对材料做了扫描，关键词搜索也显示不出想要找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拼写不同，例如，雇佣兵的名字或化名的拼写千差万别；或者是由于对老式排版或手写文件的数码字符识别度很低。

46. 然而，搜寻进程之所以无法做到广泛全面，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不是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制约，而是相关会员国并没有都给予充分、真诚和积极的合作。我感谢一些会员国的协助，但要全面了解情况和事实，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只有比利时和德国这两个会员国明确申明，其搜寻范围包括国防、情报和安全档案；然而，即使就这两个会员国，也尚不清楚这些搜寻是否做到了详尽无遗。

47. 有理由要求会员国给予更大合作。一直以来的倾向是，披露越来越多的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新资料，而不披露情报、安全和国防当局或机构掌握的资料；鉴于1960年代初刚果面临高度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冷战局势，这些机构可能掌握更多新资料。因此，迄今所做的搜寻和查找工作不能说是全面的。

48. 我们为搜寻相关资料所做的努力产生了结果，不断发现更多具有证明价值的材料。相关资料的线索并未逐渐减少或接近耗尽；如现阶段的搜寻所表明的，这些线索仍包含丰富信息。因此，有理由得出结论，即进一步搜寻有可能找到有关这一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的更多相关资料。

四. 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49. 本节讨论从会员国和个人收到的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A. 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

50. 独立小组指出，自1961/62年调查以来，出现了一些与以下假设有关的重大新资料：另一架飞机击落了SE-BDY，或以其他方式威胁该飞机致其坠毁。独立小组结束工作后，从个人和会员国收到了进一步资料。

1. 侦听到的无线电通话：Paul Abram

51. 2015年，独立小组经安排与Paul Abram联系，他说他曾是美国空军安全局军官。Abram在与独立小组的一次约谈中说，1961年9月17日至18日夜间，他听到关于在刚果或其附近击落一架飞机的通话。Abram当时隶属美国国家安全局驻希腊Irakleio的一个监听站。Abram宣称，在1961年9月17日之前几天，监听站交给他SE-BDY的预计飞行计划，其中包括关于飞机机型和“飞机编号”的资料，并注明目的地为恩多拉。他说，9月17日至18日夜间他在值夜班时，听到有人在无线电上说：“飞机过来了……机上的灯很亮”，随后有人在另一个频率

上说：“美国人刚刚击落一架联合国飞机”，他根据口音认为说话的不是美国人。这些通话之后，“无线电杂乱通话”大量增加。Abram 相信他在所述期间没有听到任何来自 SE-BDY 的通话。他说，在实时侦听到这一通话后，他立即将听到的内容告诉了同事；随后，在场的其他军官收听了重放的通话录音。他还说，他将这一信息录了下来，录音带原件和信息内容传真应该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情报和安全组织——政府通信总部。他说他的国家安全局上司在 Irakleio 和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凯利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安全局总部。

52. Abram 向独立小组提供了他的退役记录副本和一份文件，其中显示他在希腊 Irakleio 参加了“教育服务方案”。根据 Abram 的证词和文件，小组请美国提供资料，说明 Abram 在有关时间是否在美国空军或政府其他部门服役，他是否驻扎在希腊，当时是否以及以何种身份为国家安全局工作。截至小组完成工作时，美国没有回应这一提供资料请求，但联合国秘书处在 2016 年做了后续跟进。对此，美国在 2016 年 6 月答复称，美国空军没有关于 Abram 的资料。它没有回答询问的其他问题。

53. 2016 年，Abram 向联合国提供进一步文件，意在证明其服役经历，包括他的身份识别号/代号“AbelBaker”。由于先前的问询未得到答复，考虑到 Abram 提供了进一步资料，我将这一资料的副本提供给美国，请其就 Abram 声称他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听到的通话发表评论，包括确认他提供的有关其服役记录的资料是否真实。2017 年 6 月，美国向我做出如下答复：“我们无法找到关于 Abram 先生的任何进一步资料。我们不能鉴定你提供的据称显示 Abram 先生服役情况的文件的真伪。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掌握任何资料或文件可以支持 Abram 先生的说法或为其提供证明。”

54. 2017 年 7 月 17 日，即本报告定稿前几天，我收到美国的另一份来文。这是一份五页的表格，第一页与 Abram 提供给独立小组的服役记录内容相符。其他几页的内容似乎是有关他服役情况的行政记录，包括专业职务“语音侦听规程专家”、获奖情况、接触机密文件许可、出勤记录和外国服务标志。这份资料附有一封信，称“美国空军记录……显示 Paul Abram 于 1959 年 10 月 24 日开始在克里特服役。记录还显示，Paul Abram 返回美国的时间是 1961 年 4 月 7 日。因此，1961 年 9 月 Paul Abram 似乎不在克里特”。收到美国提供的新资料后，我向 Abram 概要口述了表格中的字面内容，请他做出回应。Abram 确认了表格中的诸多细节，并再次确认其先前关于在克里特服役的说法。不过，Abram 称表格所列日期不可能是正确的(他根据 1959 年 10 月左右发生的其他一些重要生活事件做了回忆)，并说 1961 年 9 月时他肯定在克里特，而且他认为记录(包括他在克里特服役的期限和起/止日期)有误。

55. 美国提供有关 Abram 的资料是一个重要的事态发展。过去两年，尽管已将有关 Abram 的大量详细信息，包括其服役地点、职务、服务纪录编号等传给美国核查，但美国表示没有关于此人的资料。现在收到的资料实际证实了 Abram 的说法，即他曾在克里特为美国空军安全局工作，担任侦听专家，尽管表格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否隶属国家安全局。不过，表格中的信息与 Abram 所称 1961 年 9 月时

他在克里特的说法不符；他说表中信息有误。我注意到，新文件似乎是一份内部用军事表格，上面有许多缩略语，包括军事词汇。鉴于我是在报告定稿前几天才收到这些文件，我没能提出后续问题，或就此征求专家意见。

56. 针对提供给独立小组的材料、Abram 提供的关于其作为空军安全局军官服役的补充资料以及从美国收到的答复，仍有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保持独立小组的评估，即 Abram 提供的关于 SE-BDY 遭到袭击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2. 雇佣军飞行员或其他特工介入的可能性：Van Risseghem

57. 2015 年独立小组收到信息称，一个名为 Van Risseghem(也称为“Van Reisseghem”、“Van Rysseghem”、“Van Reisinghan”、“Van Riesegehel”和其他变称)的比利时飞行员可能驾驶一架 Fouga Magister 击落了 SE-BDY。特别是，独立小组审查了美国提供的从利奥波德维尔发往华盛顿特区、日期为 1961 年 9 月 18 日的一封信，Gullion 在信中说，“[SE-BDY]有可能是被一名飞行员击落的，这名飞行员骚扰过联合国的行动；据一个通常很可靠的消息来源指认，这个飞行员名叫 Vam (rpt VAK) Riesegehel，比利时人，在所谓的加丹加空军接受过飞行训练。以前他被当成了身份不明的罗得西亚人。只要他仍在活动，就有可能破坏空中救援行动。”

58. 但是，根据比利时和美国提供的其他资料，独立小组发现，比利时当局已认定，Van Risseghem 在 1961 年 9 月 16 日之前没有离开布鲁塞尔，因此，他不可能在加丹加对 SE-BDY 实施空袭。具体来讲，比利时(包括比利时特工部门)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 Van Risseghem 已于 1961 年 9 月 8 日登记从加丹加返回比利时。比利时的调查结论认为，Van Risseghem 于 1961 年 9 月 8 日至 16 日期间在比利时境内，因而来不及在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晚前从比利时返回刚果。小组还收到了一份日期为 1961 年 9 月 22 日、由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发往华盛顿特区的电报，其中写到，据比利时官员称，Van Risseghem “应当是于 9 月 17 日在驻布鲁塞尔的加丹加‘使团’发给他的退役酬金收据上签了字。”不过，比利时政府指出，他签字的文件是让别人代他从“萨比那共济基金”领钱的委托书，当时他可能仍在布鲁塞尔，也可能已经到了巴黎转道去刚果。

59. 2017 年我收到更多关于 Van Risseghem 的资料，表明在相关时间他可能在加丹加。联刚行动主管军官 1962 年 10 月 8 日给秘书长的报告(S/5053/Add.12)附件一阐述了在加丹加的雇佣军问题。关于 Van Risseghem，报告说，他“在 9 月敌对行动期间驾驶一架 Fouga(Delin 驾驶另一架)……1961 年 8 月 28 日在伊丽莎白维尔被捕，1961 年 9 月 7 日从卡米纳遣返至布鲁塞尔(Mil.Info，案卷号 59)……被称为‘Jan 上尉’。1961 年 9 月 7 日被遣返，但作为 Fouga 飞行员之一又回来参加了 9 月的敌对行动。雇佣军问题联合委员会 1962 年 3 月 7 日的报告第 14 段将其列名”。1962 年联合国空军情报日志也记录他于该年 4 月返回并出现在加丹加，当然这是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事件大约半年之后。

60. 2015 年和 2017 年从美国收到的资料显示，1961 年 9 月 15 日，Gullion 向国务卿转达信息，指出有报告称“一架单引擎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卡米纳。塔台与

战斗机有语音联系。飞行员似乎是比利时人。在用火箭弹和机关枪袭击后，飞行员说他将返回并再次发动攻击”。目前还不清楚凭什么认为飞行员似乎是比利时人；虽然 Van Risseghem 是比利时人，当时在加丹加的其他雇佣军飞行员也是比利时人。次日，即 1961 年 9 月 16 日，Gullion 给国务卿发电报说，“商用飞机飞行员昨天下午报告其与加丹加喷气机短暂并翼飞行，他确认飞行员是我们所知道的身材高大、胡须浓密的 Van Reisseghem，加丹加空军教练员。大概在 5 月 1 日从布鲁塞尔抵达加丹加。据称是比航飞行员。据信是唯一能驾驶现有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哈马舍尔德同一天也请比利时协助制止 Van Risseghem 侵犯联合国及其财产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平民的袭击。正是根据这一请求，比利时进行了上文提到的调查。

61. 就相关时间 Van Risseghem 是否有可能在加丹加，提供的资料相互矛盾。比利时的调查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但它并没有确信无疑地证明这一结论。比利时当时掌握的情报资料的完整性也值得怀疑，因为 2017 年收到比利时提供的 1961 年 9 月 Van Risseghem 档案中的进一步资料，说明具备飞行条件的唯一一架“Fuga Magister”的飞行员是 Peter Wigstead(此为“语音”拼法；在其他资料中拼写为“Wickstead”或“Wicksteed”)。其余证据证实，当时有 Wicksteed 以外的飞行员能够操作 Fouga，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证据。美国和联合国提供的资料表明，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之前 Van Risseghem 可能已在加丹加，但这一信息也不准确，可能是根据不完备的情报得出的。因此，我现在不能就这一问题得出结论。我评估认为，就一个名为 Van Risseghem 的比利时雇佣军飞行员参与了对 SE-BDY 的空中袭击的资料，其证明价值为“弱”，没有任何依据来改变这一评定结果。

3. 雇佣军飞行员或其他特工介入的可能性：Beukels

62. 关于存在空中袭击或其他干扰的一个假设涉及一种说法，即一个名为“Beukels”的比利时籍雇佣军飞行员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意外击落了 SE-BDY。据说“Beukels”在 1967 年把这件事告诉了哈马舍尔德的前个人助理(1957-1961 年)Claude de Kemoularia，后者后来成为法国著名外交家和商人。他经 De Troye 先生和 Grant 先生(此二人可能也是前雇佣兵)安排，在巴黎几次与“Beukels”面谈，其间后者讲述了这件事。这一假设以前并不广为人知，直至《卫报》在 1992 年 9 月 11 日刊登联合国前高级官员 George Ivan Smith 和 Conor Cruise O'Brien 的一封信论及此事。瑞典外交官、坠机发生时瑞典驻刚果代表 Bengt Rösö 在其 1993 年的报告中也讨论了这一假设。他在 1992/93 年为瑞典政府编写了题为“恩多拉灾难”的调查报告。De Kemoularia 在自己的回忆录 *Une vie à tire-d'aile: Mémoires*(2007 年)中叙述了他与“Beukels”的会面。已出版的 *Mémoires* 中的描述与 Rösö 报告中的说法基本相同。

63. 独立小组审议了 Beukels 讲述的内容细节。根据 De Kemoularia 的叙述，所称内容大致如下：Beukels 说，1961 年 9 月 17 日夜晚，他驾驶一架 Fouga Magister 型喷气式飞机从科卢韦齐机场(位于恩多拉西北约 430 公里)起飞，由未指明姓名的飞行员驾驶第二架 Fouga Magister 伴行。据称，他们两人受 X 先生(据信是一

个凌驾于军事指挥之上的高级别人士)和加丹加部队总司令 Lamouline 中校之命,在恩多拉附近拦截 SE-BDY,使其改道前往卡米纳机场(位于恩多拉西北约 620 公里),让哈马舍尔德在那里会晤一名“很有影响力的欧洲公司高管”。Beukels 说他拦截了 SE-BDY,并用无线电告诉其转往卡米纳。当 SE-BDY 没有遵照指令改变航向时,据称 Beukels 就用 Fouga 的机关枪从 SE-BDY 后部开火,结果意外击中了这架 DC-6 的水平尾翼。随后,飞行员失去控制,飞机坠毁,燃起了大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的报告更全面描述了 Beukels 的说法。

64. 独立小组评估了 De Kemoullaria、Smith 和 O'Brien 提供的关于一个名为“Beukels”的比利时籍雇佣军飞行员介入事件的资料的证明价值。在评估时,小组“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De Kemoullaria]没有在 1993 年之前提供这一信息”,特别是鉴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 Brian Urquhart 在 1968 年时显然曾建议 De Kemoullaria 将此事通知警察。小组的理解是,他没有这么做。部分基于这一点,独立小组评估认为,有关 Beukels 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然而,我担任知名人士后获得资料,表明实际上 De Kemoullaria 向当局通报此事的时间比小组理解的要早得多。

65. 2017 年 5 月,经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安排,我与已故 Claude de Kemoullaria 的女儿 Elisabeth 取得联系。她提出愿意帮助我,既是为了缅怀已故的父亲,同时也表达她所理解的父亲对达格·哈马舍尔德的高度敬佩。我得到了 Claude de Kemoullaria 1951 至 1992 年及 2006 至 2012 年期间的记事本原件,以及大约 20 箱他的个人记录,其中包括法文(占多数)及英文、阿拉伯文、格鲁吉亚文和俄文记录。我感谢获得的这些重要和有益的帮助。

66. 在 1967 年的记事本中,我发现 1 月至 5 月间有各种记号涉及 De Kemoullaria 就这一问题的会面。第一次是 1967 年 1 月 24 日,记道“De Troye et Grant sur X Dag H”。2 月 5 日和 8 日有详细的类似记录,2 月 11 日的记录包含一点说明,“avant visite du Pilote du Fouga Magister”,2 月 13 日的内容指明飞行员是“Beuchels”。1967 年 2 月 14 日、3 月 10、13、18、25 和 29 日、4 月 3 日和 13 日以及 5 月 2 日记录了与 De Troye 的更多次见面(Grant 和 Beukels,后来拼写为“Beukels”显然不在场)。3 月 10 日起,一些记录在 De Troye 名字旁边提到货币(似乎是“francs ancien”)数额,大概是指 De Kemoullaria 在这些日期将这些数额给了 De Troye。两条记录提到“*He Lecluse 20 Rue Lecluse 17° T=LAB 4926*”。这一条的第一部分似乎是一个巴黎地址,现在是“Centre Logement Jeunes Travailleurs”(年轻工人、学生和受训人员住房中心)多个住房之一。据其网站介绍,该中心成立于 1966 年,即 De Kemoullaria 与 De Troye 见面的前一年。“T=LAB 4926”的意思尚不清楚。我注意到,联合国的记录多次提到相关时间身在加丹加、名为“De Troyer”和“Lamouline”的比利时雇佣兵。

67. 在 De Kemoullaria 的记录中,似乎有一封 1969 年 7 月 31 日寄往 7 Boulevard du Palais, Paris (1^{er}), 警察局长(Préfet) Maurice Grimaud 收的信件传真副本或草稿。此信第一段写道:“你大概一定还记得我对你讲过的我与一名前刚果雇佣兵面谈的事,我是经一个朋友,合众国际社记者 Robert Ahier 介绍认识此人的。他声称

知道达格·哈马舍尔德死亡情形的真相。作为已故联合国秘书长的前同事，我自然会努力抓住一切机会了解真相。我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68. 信的其余部分描述了 De Kemoularia 与 De Troye 的交往情况，包括他给后者“适度”资金援助(信中补充说此举很谨慎)，并提到一名来访的年轻男子告诉 De Kemoularia，De Troye 的真名是“Claude Bastard”。不清楚为什么 De Kemoularia 在给警察的信中说，他不知道 De Troye(Bastard)的地址，因为他在 1967 年记事本记录中 De Troye 的名字旁边记了一个巴黎地址。目前不清楚这封日期为 1969 年 7 月 31 日的信是否确实送交了警察局长；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没有被送交。此外，信的第一段提到 De Kemoularia 已将此事告知警察局长。因此，这封信表明，实际上 De Kemoularia 早在 1993 年之前就已将 Beukels 的说法通报了当局。

69. 此外，在 1974 年的记事本中，11 月 15 日有一处提到“Belfrage/Hadelstan”。1993 年 2 月 9 日，De Kemoularia 写信给 Rösiö，转送他 1967 年与 Beukels 和其他人会面的记录，信中提到上条记录。在给 Rösiö 的信末尾，他还补充写道，“随附的 71 页文件是在上塞纳省我家里，由 George Ivan Smith 录下我的口述后打字记录而成。我在 1974 年 11 月 15 日向 Belfrage 大使和时任瑞典外交部政治事务负责人 Hadelstan 先生报告了全部内容”。因此，这封信表明，实际上 De Kemoularia 早在 1993 年之前也向瑞典当局报告了 Beukels 的说法。

70. 哈马舍尔德委员和独立小组均无法确定是否还能找到 De Kemoularia 关于与 Beukels 及其他人会面的原始记录以及 George Ivan Smith 对 De Kemoularia 口诉内容的录音。应当指出的是，Smith 的记录很全面，有大约 70 页长，但他在 1981 年 12 月 8 日给 De Kemoularia 写信转送这些记录供后者审阅时却提到，这些记录是一次时间更长的讨论的摘要。同时，鉴于记录是 1981 年做的，而 De Kemoularia 可能在此后的任何时间(包括在他 2007 年回忆录中)对任何误解或信息空白做了纠正。他选择不这样做，这就很值得注意。

71. 独立小组设法核实“Beukels”所说的各方面内容。它请比利时和法国查找有关“Beukels”的资料，但这两个会员国都没有找到任何资料。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在 2015 年 6 月 2 日的答复中表示，经搜寻外交与国际发展部档案，未发现有关“de Kemoularia 与一个名为‘Beukels’的比利时飞行员就达格·哈马舍尔德之死进行谈话”的任何资料。似乎没有对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审查。

72. De Kemoularia 在更早的时候，即 1969 年 7 月即向警方报告了此事，并于 1974 年 11 月 15 日向瑞典外交部高级官员做了通报，这些都强化了这条资料的可靠性。此外，De Kemoularia 似乎没有个人利益作为动机。然而，De Kemoularia 1967 年记事本的内容和关于这一事项的其他文件披露的补充信息有限，不足以证明向 De Kemoularia 讲述的事件的可靠性或证明其真实性。就这一点我想概括指出，我不怀疑 De Kemoularia 听到了据他说是从自称 De Troye 和 Beukels 的人那里听到的事件叙述，也不怀疑他诚意转述了听到的内容。获得的新资料支持这些评估。但是，新资料并不会使所述事件属实的可能性增加或减少。对此仍需进一步调查。鉴于 De Kemoularia 关于 Beukels 的原始记录和原始录音磁带都还没找到，需要查找关于 Beukels 的资料，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表明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塔人员合

谋参与了声称的袭击及其后掩盖实情，而且缺乏独立确证来支持 Beukels 所述事件的某些关键内容，我评估认为，2015 年以来获得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但是，如果所述内容的真假得到证明，又例如，可以最终确定当时在加丹加是否有两架可运行的 Fouga 喷气式飞机(下文进一步讨论)，则可以重新审议上述评估结果。

4. 可能的飞机类型和起降机场

73. 独立小组评估了关于指称使用了 Fouga Magister 喷气机、De Havilland Dove 或 Dornier DO-27 或 DO-28 飞机对 SE-BDY 实施空中袭击的资料，认为其证明价值为“弱”。小组指出，这一评定的依据是对飞机性能的评估以及使用这种飞机实施攻击存在的操作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如上文所述，我在工作过程中收到了塞内加尔空军前参谋长 Da Costa 上校(退役)和事故调查员 Sven Hammarberg 就这一问题提供的专家意见。这两名专家也是战斗机飞行员，Da Costa 本人曾驾驶过 Fouga Magister 喷气机。我还收到了比利时、德国、美国和联合国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新资料。

(a) 飞机：Fouga Magister

74. 独立小组评估认为，关于声称 SE-BDY 坠机事件发生前曾向加丹加部队运送了三架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小组指出，它没有收到任何资料支持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David Doyle 就这一说法提到的一点，即这架飞机是“法国人”、中央情报局或指明的任何其他来源提供的。美国在 2016 年证实，1960 年代初 Doyle 曾在刚果地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根据 2016 年向联合国和 2017 年向我提供的资料，现在可以明确地说，1961 年 2 月似乎确实有三架 Fouga(有些资料中将其误写为“Fuga”或“Fugha”)Magister 喷气式飞机被运到加丹加。这一资料的内容摘要如下。

75. 1961 年初公开出现了关于有 Fouga Magister 飞机从法国运到加丹加的报告。美国曾在 2015 年 6 月 9 日的信中告知独立小组，“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搜寻，没有发现关于在所涉时间在加丹加地区存在 Fouga Magister 飞机的任何文件”。但是，2017 年美国向我提供资料，包括美国国务院 1961 年 2 月 13 日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国务院请美国公司“七海航空公司”总裁不要从法国向加丹加运送九架喷气式飞机，“如果七海航空公司继续提供喷气式教练机，美国政府将严肃处理”。尽管如此，七海航空公司似乎在 1961 年 2 月 16 日或该日前后第一批运送了三架 Fouga Magister(订单总数为九架)。第二天即 1961 年 2 月 17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新闻稿，指出“法国当局了解到据报有三架‘Fouga Magister’教练机被空运到加丹加”，并说法国政府已开始调查此事。

76. 根据从美国收到的资料，1961 年 2 月 21 日当天或前后，加纳外交部长就 Fouga 喷气式飞机一事给美国驻加纳大使馆发出照会。照会似乎证实，1961 年 2 月 16 日，属于七海航空公司、由美国公民值机的一架美国民航飞机将三架飞机从法国运到加丹加，此为比利时购机订单的一部分。后来，法国政府似乎做出保证，从“Potez”公司订购的九架飞机中的其余六架 Fouga 飞机将留在法国，不运往加丹

加。我检查了联合国的记录，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余六架 Fouga 喷气机或任何其他飞机在 1961 年运抵加丹加。在上述事件之后，会员国、联合国和七海航空公司之间有大量的进一步信函往来。不过，在此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无助于本报告的目的；本次调查所要确定的相关事实是，1961 年 2 月 16 日或前后有多少架 Fouga 喷气式飞机被运到加丹加。答案似乎是 1961 年 2 月运送了三架，我评定这一新资料的证据价值为“强”。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显示，如 Doyle 声称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介入了 Fouga 喷气机运送一事。

77. 然而，仍存在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这些喷气机中有多少架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晩是可以运行的？Hammarberg 援引 Leif Hellström 所著(只有瑞典文版)的一本书指出，当天只有一架 Fouga 在用(还有一架 Caribbean Tri-Pacer 和一架 Dove)。他说，这是因为由“Dagonnier”驾驶的一架 Fouga(标号为#91)1961 年 6 月 23 日在飞行训练时在伊丽莎白维尔附近坠毁；另一架(#92)因机械故障停飞，1961 年 7 月一直停在 Luano Elisabethville 机场，后于 1961 年 9 月 13 日在“Morthor 行动”中被联合国没收，联合国部队随后销毁了驾驶舱仪器。

78. 关于加丹加省政府武装部队包括其空军的能力问题，比利时在 2017 年 6 月向我表示，国防档案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但它提供了一份题为“Avions Katangais”的文件，并表示可在互联网上免费找到。该文件指出，它是“Luc Badoux 在 Jean-Pierre Sonck 和 Leif Hellström 的协助下”编写的(Leif Hellström 可能是拼写错误，应为“Leif Hellström”，即 Hammarberg 引述的来源)。文件没有注明编写日期或编写目的，它被放在 www.likasi.be 上。这似乎是为加丹加 Likasi(原 Jadotville)前居民办的一个私人管理的网站。文件列明，1961 年 9 月 17 日至少有 14 架飞机处于运行状态，可供加丹加航空公司或加丹加空军使用，其中包括 Douglas DC-3s、De Havilland Doves、Sikorsky 直升机、Pipers、一架 Beechcraft 和一架 Fouga。2017 年 6 月 21 日，我请比利时就“Avions Katangais”文件提供进一步信息，包括研究人员依据的信息来源。2017 年 7 月 18 日，我在最后定稿本报告时收到比利时的答复，列出了作为信息来源的两个互联网网站以及国防部在调研时用到的若干书籍的名称。我没有机会核实这些来源。

79. 如果 Hellström 和其他人的研究所述是真实的，那么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晩就只有一架 Fouga(#93)可以运行。联合国的某些文件也提到，当时只有一架 Fouga 可用。但是，来自会员国和联合国的其他资料与这一结论相抵触，这些资料显示，在相关日期或紧接该日之前，不止一架 Fouga 可以运行。例如，在 1961 年 9 月 15 日 Gullion 给美国国务卿的两份电文中，提到不止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其中一份电文中，Gullion 写道：“鉴于多架加丹加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时断时续地扫射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比勒陀利亚军队-海军专员的飞机应守住恩多洛，与在伊丽莎白维尔 SSB 的美国空军武官 Matlick 联系[使用单边无线电波段]以协调行动”。同一天的另一份电文说，“空中飞行的所有喷气式飞机肯定都是[Fouga] Magister”。1961 年 9 月 16 日上述两方之间的一份电文说，“据信有两架[Fouga] Magister 可以运行”，“明显关切”那架喷气机可能夜间出动(执行飞行任务)。1961 年 9 月 18 日从纽约发给美国国务卿的一封信指出，“[联合国工作人员]Ralphe

Bunche 说，如果将一个比利时人驾驶两架 Fuga 喷气式飞机的故事写进小说，世界不会相信。他说，这些飞机削弱了联合国日间飞行的能力，但由于缺乏适当设备，它们实际上无法在夜间飞行。Bunche 大胆猜测，若不是孤身一人的比利时飞行员驾驶两架战斗机，[秘书长]就不会乘夜航飞行”。1961 年 9 月 20 日从美国国务院(Bowles)发往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封信写道，“一架或一架以上的加丹加喷气教练机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得以反复多次轰炸和扫射联合国设施，包括卡米纳机场和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据报加丹加喷气机摧毁了大约 7 架联合国飞机，导致实际上无法通过空中途径加强在加丹加的联合国部队”。后来，Gullion 在 1961 年 9 月 23 日给美国国务卿的一封信中转达了来自美国空军武官(Matlick)的消息，“今天上午，加丹加空军的 Dove 飞机在恩多拉接上了今天从科卢韦齐返回的比利时、罗得西亚和南非雇佣军。……据传有两名飞行员驾驶 Fuga”。消息还说，“已告知联刚行动喷气机能力增加(我们仍然相信在科卢韦齐有两架[Fouga]喷气式飞机可以运行)”。1962 年 10 月 8 日，联刚行动主管军官给秘书长的联合国报告最先指出，1961 年 9 月敌对行动期间，仅有一架 Fouga 运行。但是，同一份文件后来在谈及 Van Risseghem 时说，他“在 9 月敌对行动期间驾驶其中一架 Fouga(Delin 驾驶另一架)”。

80. 对联合国部队发动袭击的次数也表明，单靠一架 Fouga 很难做到。联合国档案显示，每天似乎发生多次 Fouga 袭击，包括 9 月 15、16、17 和 18 日的袭击，其中涉及火箭、机枪和炸弹袭击；在这些天的袭击中，有一次炸弹袭击导致联合国人员死亡，一些联合国飞机被毁，包括一架 UNC 199、一架 DC-3 和一架 DC-4。此外，1962 年的联合国空中情报日志(档案号 805)显示，“据说[Glaspole]在 1961 年 12 月的行动中驾驶 Fouga 飞机，并对其中一架坠毁负有责任”。在联合国档案中找到了另一份相关文件，日期是 1963 年 3 月 4 日，显然是从加丹加部队那里缴获的。文件是“加丹加航空少校”J.C. Puren(显然是南非雇佣兵 Jerry Puren)写给“加丹加国家总统”的，其中用法文写道，当时(即 1963 年)在 Kisenge 还有一架 Fouga，显然处于运行状态。1962 年和 1963 年的这两条联合国情报中若有一条是正确的，就会使 1961 年 9 月时不止一架 Fouga 处于可运行状态这一说法更有说服力。

81. 因此，有一些证据表明，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有不止一架 Fouga 在运行。我评估认为这项证据的证明价值为“中”。我在工作时限内未能完成这项调查，但我认为在联合国档案中再稍加调研，就可核实 Hellström 的研究是否正确，以及 Fouga(#91)是否在 1961 年 6 月 23 日坠毁，Fouga(#92)是否在 1961 年 9 月 13 日被联刚行动没收。

82. 我收到了有关 Fouga 的作业能力的其他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是有意义的，因为据认为，Fouga 在夜间运行或从未铺路面的跑道起飞会受到一些限制。先前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认定不大可能使用 Fouga 实施袭击。如上文所述，这些新资料的例子包括，1961 年 9 月 15 日 Gullion 的信，其中提到就 Fouga 执行夜行任务感到关切。另一封信是 1961 年 9 月 18 日从纽约发给美国国务卿的，其中说 Fouga “喷气式飞机袭击了从 Eville 飞往 Leo 途中的美国 Dakota 飞机。飞机受损，但

安全抵达 Leo”。这表明 Fouga 不仅有能力实施空对空袭击，它还袭击了在加丹加的美国飞机。

83. 关于起降机场，据指出，Delin 对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说，Fouga 可以从许多地方起飞，显然至少有一次，他“驾驶它从科卢韦齐起飞，降落在一条土道上，要想起飞，就往跑道上洒水，然后滚压”。关于在恩多拉及周围可供 Fouga 和其他飞机起降的机场数目是否有可能比早期调查认为的更多，下文将做进一步论述。

84. 如上所述，我评估认为，1961 年 2 月运送了三架 Fouga 喷气式飞机，我评定这一新资料的证据价值为“强”。关于是否不止一架 Fouga 可以运行，我认为所获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b) **飞机：Dornier**

85. 独立小组分析了学者、研究人员 Torben Gülstorff 提供的资料。资料认为，加丹加部队 1961 年 9 月可能使用了 Dornier DO-27 和(或)DO-28 飞机实施袭击。小组还注意到，Rösiö 在其报告中指出，在对联合国的夜间轰炸行动中使用了 Dornier 飞机。

86. 2017 年，我从 Gülstorff 先生、比利时、德国、美国和联合国收到关于 1961 年 9 月在加丹加存在 Dornier 飞机的进一步资料。美国提供的资料表明，加丹加购买了至少一架 Dornier 飞机，且该飞机在 1961 年 9 月底前一直在科卢韦齐。这些资料包括 1961 年 7 月 26 日的一份电报，称“第一架 Dornier 预计本周运抵伊丽莎白维尔”，还有 9 月份的多份报告称存在 Dornier 飞机。这符合 1961 年 7 月 7 日联合国一份备忘录所述内容，其中显示收到报告称，加丹加购买了带有军事装备的德国 Dornier 飞机。备忘录交给了“德国观察员”，后者告知将调查此事。

87. 2017 年从 Gülstorff 先生和德国收到的资料包括 1961 年 10 月 5 日来自西德外交部的一封信，称“订单中的第一架飞机”已在 1961 年 8 月 21 日由德国飞行员驾驶、搭载比利时进口商飞抵伊丽莎白维尔。后来有一份 1961 年 11 月 24 日来自联邦经济部的文件似乎证实，第一架 Dornier DO-28 于 8 月 21 日从慕尼黑国际机场起飞，途经意大利飞往加丹加，由 Dornier 公司飞行员 Schäfer 先生驾驶。据说第二至第五架 DO-28 直到 1961 年 10 月 8 日才从同一机场起飞，由比利时飞行员驾驶。最后，1961 年 12 月 21 日来自慕尼黑“ZFST”的一份文件提供了进一步信息，包括登记号“Ka-3016”，而且收据表明，这架飞机的购买人是加丹加的 John Cassart。收到的其他资料所载信息与上面的引述内容相同。

88. 上文提到的比利时提供的有关 Van Risseghem 的资料也提到 Dornier 飞机，很可能是因为购买人 Cassart 的国籍使这一购买交易也牵连到比利时。该文件有部分删改，日期似乎是 1961 年 9 月。文件指出，“在联合国行动开始前”(推定是指 1961 年 8 月的“Rumpunch 行动”或是 1961 年 9 月的“Morthor 行动”，两者都是在 SE-BDY 坠机之前执行的)，Cassart 上校乘坐一名德国飞行员驾驶的只用于运输的 Dornier 飞机离开，经过布拉柴维尔紧急飞往科卢韦齐，以加强加丹加空军部队。关于同一问题，来自比利时的资料显示，有可能但不能肯定(订购的四架飞机中的)第二架 Dornier 从德国直接飞到了加丹加。

89. 1961年10月30日的联合国军事信息报告指出,一架Dornier DO-27或DO-28从Kaniama起飞,似乎企图在空中拦截一架联合国DC-4,当时该架DC-4正在收集一架Dove飞机的信息,它看到该飞机轰炸了Kaniama附近的一个村庄。联合国DC-4飞行员避开了Dornier,后来又转回,观察到Dornier飞机和Dove飞机都停在Kaniama机场。1961年12月的一份联合国新闻稿指出,当月有一架加丹加空军Dornier飞机利用在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机场,对在伊丽莎白维尔机场的联合国发动炸弹袭击。

90. Hammarberg援引Leif Hellström所著的一本瑞典语书称,1961年9月28日之前,似乎没有向加丹加空军提供配备炸弹架的Dornier飞机。然而,这一信息与上文讨论的其他信息有冲突,而从多个来源获得的其他信息却相互一致。

91. 2017年收到的资料强化了、但并没有显著补充2015年向独立小组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即Dornier DO-28飞机是在1961年按商业条件从西德供应给加丹加的,其中至少有一架飞机1961年9月17日至18日夜晚之前出现在加丹加,这架飞机可能进行了改装,用于实施空中袭击和轰炸。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无论加丹加空军在1961年获得的是哪一架Dornier飞机,该飞机开展了行动,包括白天和夜间的轰炸行动,且据报在相距大约1000公里的两个地点(Kaniama和恩多拉)开展了行动,至少有一次企图进行空对空拦截。虽然其中一些行动是在SE-BDY坠毁后观察到的,但它们事关Dornier飞机是否有能力开展此类行动。与此同时,现有资料本身并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Dornier飞机被用于对SE-BDY实施袭击;因此,我评估认为,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不过,我在结论部分会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c) 机场

92. 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收到来自联合国档案的资料,表明相关时间在加丹加可能有比原先认为的数目更多的机场。我还收到来自美国和联合国的其他资料,表明加丹加部队显然不限于使用在加丹加的机场。地理空间信息科大力协助绘制了地图,我将其附在本报告之后,以直观图示这一信息。

93. 关于加丹加拥有的机场,我注意到主要资料来源是1962年5月的一份联合国军事信息文件,题为“加丹加省的机场”,其中列明了当日加丹加省内的50多个机场和简易机场。为确定1961年9月在加丹加的飞机(De Havilland Dove、Dornier DO-28和Fouga Magister),并根据Da Costa和Hammarberg提供的信息,我认为仅列为“紧急用”简易机场和长度在750米以下的机场无相关性。这两名专家还告诉我,Fouga需要封闭的(沥青或混凝土)铺面跑道,因为草面跑道或砾石跑道有可能扬起异物,损害喷气式飞机。与此同时,我确实注意到有证据,包括Delin的证词表明,Fouga至少有一次可能是从非封闭的跑道起飞或降落。我还注意到,现有记录中似乎不存在任何证据证明为加丹加的机场配备了特别装备,用于夜间起飞或降落。不过,在早期调查的记录中写有临时解决办法,例如用煤油和沙子作照明弹。

94. 有关机场的其他新资料表明，加丹加部队使用了在北罗得西亚的机场。1961年9月23日美国领事 William C. Canup 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中指出，据称北罗得西亚准许加丹加的飞机使用在恩多拉的机场。1961年12月的一份联合国新闻稿也指出，一架加丹加 Dornier 飞机利用在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机场，对位于 250 多公里之外的伊丽莎白维尔机场的联合国设施发动了炸弹袭击。

95. 我评估认为，关于加丹加部队在加丹加和北罗得西亚可能使用比以前确定的数目更多的机场的新资料，其证明价值为“中”。

(d) 加丹加空军飞行员

96. 如下文所详述的，早期的调查一直依赖根据 Delin 提供的证据得出的假设，即只有一名加丹加飞行员可能驾驶飞机袭击 SE-BDY。然而，新资料表明，可能有更多飞行员。联合国文件，包括 1961 年 1 月 17 日的一份加丹加空军人员名单显示，至少有 32 人(14 名飞行员加上无线电操作员和技术员)。尽管其中许多人在 1961 年被遣返回国，根据联合国空军情报日志，1962 年 4 月在科卢韦齐(加丹加控制下的主要机场)有 11 名雇佣军飞行员。虽然这是坠机大约半年之后，但其他资料显示，其中一些或是全部飞行员 1961 年 9 月时可能在加丹加。联合国文件确定 1961 年末至 1962 年初在加丹加有能力担任飞行员的其他雇佣兵包括 Delin、Gelen、Glaspole、Hirsch、Magain、Puren、Van Risseghem、Verloo 和 Wicksteed。

97. 关于在加丹加服务的外国军队、准军事部队或非正规(包括雇佣军)人员问题，比利时也提供了从其安全档案中找到的有关 Charles Huyghe 和 Jerry Puren 的资料。关于 Huyghe，资料显示，他在 1961 年 8 月 3 日被联合国从加丹加遣返回国。关于 Puren(给出的其他拼写有“Purren”和“Pureh”，别名“Du Plessis”)，经部分删改的资料显示他仍在加丹加，但资料未注明日期。这一新资料没有具体说明这两人可能当过飞行员。

98. 根据我的调查现况，鉴于以上所述，我无法判定在相关时间，究竟有多少或者有哪些雇佣军飞行员在加丹加。但似乎可以确定飞行员人数比早期调查认为的更多。我评估认为，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加丹加武装部队中有不止一名飞行员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但对这一资料需做进一步核实。

(e) 埃塞俄比亚喷气式飞机

99. 我还收到资料显示，1961 年向刚果部署了埃塞俄比亚喷气式飞机以支助联刚行动。根据 Hans Kristian Simensen、美国和联合国提供的资料，这些飞机部署到刚果的时间比原来预计的要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导致无护卫的 SE-BDY 受到袭击，而且可能是为了实施袭击，故意合谋推迟埃塞俄比亚喷气式飞机的抵达时间。这些飞机似乎有可能比联刚行动指挥部最初希望的到得更晚。然而，我没有看到资料使我相信在本报告中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查明事实。部署埃塞俄比亚喷气机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到政治协议和后勤安排。延迟部署可能是因为没有获得飞越英属东非领土的许可，但到了 1961 年 9 月 20 日仍有许多未解决的后勤问题，包括加油、维护、使用哪些机场作业以及其他事项。即使证明埃塞俄比亚喷气机是被故意拖延抵达，仍需证明更多细节才能接受以下说法，即

这是一场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使 SE-BDY 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遭受攻击，或者在其他因素配合下，拖延抵达能产生这种效果。因此，就表明为支持联刚行动而调派的埃塞俄比亚喷气机是故意被拖延部署从而对 SE-BDY 的安全安排造成不利影响的资料，我评估其证明价值为“弱”。

B. 人为破坏：Celeste 行动/南非海洋研究所

100. 根据威廉姆斯女士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假设，即放置在 SE-BDY 上的一枚炸弹在飞机就要着陆前被引爆，导致飞机坠毁，据称这一举动的目的是“除掉”哈马舍尔德。据称这一阴谋被命名为“Celeste 行动”，由一个名为“南非海洋研究所”的隐秘组织执行。这一假设在 1990 年代末引起公众关注，当时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档案，其中包含大约 12 份有关所谓 Celeste 行动的文件。

101. 威廉姆斯女士和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力图获得有关 Celeste 行动的文件原件，以便对其真实性进行技术评估，但未果。为了审议这一假设，独立小组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致函南非，请其查找和分享有关这些文件的任何记录或其他材料。截至小组完成工作时，没有收到南非的答复；因此，它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有关 Celeste 行动的说法缺乏证明价值。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无法确定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文件过手链条不确定，不能确认 1961 年 9 月南非海洋研究所是否存在。

102. 2016 年，联合国就此事与南非做了跟进联系。2016 年 7 月 1 日，南非致函联合国，指出“在南非共和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1990 年代举行听证期间作出了一项披露，暗示‘南非海洋研究所’可能插手了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罹难事件”。南非表示它完全支持此项调查，并说南非司法和宪政发展部已经指示查找任何相关文件、记录或资料，之后将根据南非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考虑索要这些资料的请求。然而，截至秘书长 2016 年 8 月向大会提交报告，他再没有收到南非的回音。

103. 2017 年 2 月和 4 月，联合国再次致函南非，跟进请求提供合作。我获任知名人士后也立即写信给南非，请其协助让我查阅所谓南非海洋研究所的文件(如第三节所述，后来还请其进一步查找资料)。为了更好地确定材料可能涉及的范围，我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前研究员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讨论了此事，她曾在 1998 年看过这些文件。我还与 George Bizos 律师讨论了从中发现 Celeste 行动文件的档案，他当年参加了相关听证会。研究员告诉我，鉴于年代久远，不能有把握地认定看到的文件是原件；但她记得文件上至少有一些该研究所的抬头可能是彩色的，从纸张质量判断，文件似乎很旧了，而且档案内各种文件的外观似乎有差异。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安排一名法证专家准备对文件进行检验。

104. 因此，我在 2017 年 4 月会晤了南非驻联合国大使，并于次日写信指出：

如我们 2017 年 4 月 26 日会面所谈，为履行我的任务，有必要确定所谓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是否真实，以便决定是支持还是否定关于“Celeste 行动”的假设；无论支持还是否定，都将对寻求真相和历史记录做出极大贡献。为

此，我有必要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原件或最初发现的文本)，以确定它们的保管链和来源、真实性、作者、内容和它们宣称的目的。在我计划访问期间，将与南非相关当局讨论开展研究包括法证研究的方式，并商定一致意见。

105. 2017年4月至7月，我继续跟进此事，但在编写本报告之时，没有收到南非关于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或任何其他资料的答复。因此，我无法重新评估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而确定其证明价值对于核实据称的破坏行为导致 SE-BDY 坠毁这一假设至关重要。

C. 人的因素

飞行员饮酒

106. 2015年，隶属瑞典空军的一名前航空军医 Ake Hassler 医生向独立小组提供资料印证他的说法，即“1961年9月的恩多拉坠机是一起普通的飞行员失误事故”。“1960年代”，瑞典国防部责成 Hassler 医生调查所有的“瑞典飞行事故”，其中就包括 SE-BDY 坠机事件。他向小组提供文件来支持他的观点，即 SE-BDY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因休息不足而导致的疲劳是坠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小组评估认为，就帮助确定疲劳是否造成 SE-BDY 坠机的一个因素方面，Hassler 医生提供的具体信息的证明价值为“弱”。尽管如此，小组将这一信息与评估认定具有中等证明价值的其它信息联系起来。下文第六节将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107. 小组结束工作后，Hassler 医生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提供了进一步资料，称其他人为因素，即饮酒造成飞行员身体损伤，是坠机的诱因。他的论据包括，1961 年期间及之前，在瑞典航空部门包括空军中存在过度饮酒和掩盖情况的文化，这意味着 SE-BDY 机组人员可能受到酒精影响，而坠机后没有充分检验其体内是否有酒精。

108. Hassler 医生的论据之一是，1961 年时瑞典对飞行员体内血液酒精含量没有法律规定的限制，因此，没有要求检验 SE-BDY 瑞典机组人员的血液酒精含量。5 月和 6 月与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函往来确认，1961 年时生效的瑞典相关法律中没有关于飞行员体内血液酒精含量的具体规定。我没有得到任何资料表明，1961 年 9 月瑞典民航当局对飞行员或其他机组人员有关于酒精限制的监管条例或规定。

109. 航空当局一致认为，机组人员即使少量摄入(乙醇)酒精，也会损害认知和视觉功能，并影响个人判断，包括注意力、处理信息、反应、表现和决策，因而是致命飞机事故的一个原因或促成因素。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将酒精定义为一种精神活性物质，它被认为是航空安全的一个重大风险。因此，国家航空当局对机组人员有酒精限制规定。

110. 2017 年 5 月，我征询邓迪大学法证和法医中心主任 Stewart Fleming 及安大略省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多伦多大学检验医学和病理学教授 Michael S. Pollanen 的意见，他们两人都曾协助独立小组审查与坠机有关的医法证据。Fleming 先生审查了邓迪大学 Ross 档案保有的文件，在此基础上就 Ross 医生、Stevens 医生和

Smith 医生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调查 SE-BDY 坠机事件时进行的毒理学分析编写了一份报告。这些文件包括汇编坠机事件医疗调查报告时使用的主要记录。Fleming 先生重新审查了这些记录，其中显示，在采集的样品中没有发现毒品或酒精。1961 年的毒理学分析考虑了机组人员的操作表现是否有可能受到毒品和/或酒精的影响，但根据检验结果，当时的结论是，毒品或酒精均没有对坠机起作用。

111. Fleming 先生在给我的报告中指出，1961 年的医疗调查总体来讲质量很高，但毒理学分析低于今天认为可接受的标准。存在的不足包括，只对飞行员 (Hallonquist) 和后备飞行员 (Ahreus) 成功进行了毒理学检测 (包括酒精水平)。提取了副驾驶 (Litton) 的样本，但由于组织腐败，检测失败；未对空勤工程师 (Wilhelmsson) 和无线电操作员 (Rosen) 进行酒精或毒品检测。此外，虽然提取了大多数罹难者的血液样本以分析碳氧血红蛋白水平，但没有用这些样本检定血液酒精含量。相反，不是用血样而是用肝和脑组织样本进行了酒精检测。按照现代规程标准，这类检测被认为不是最佳做法，部分原因是肝脏组织含有代谢酒精的一种酶，其在人死后的一段时间能继续起作用，因而有可能影响检测数据的准确性。Fleming 先生还指出，从获得样本到送交检测实验室之间有两到三天的时间间隔，没有详细资料说明在此期间样本是如何保存的。Fleming 教授又指出，1961 年时的国际通行标准与瑞典的标准不同，要求进行血液酒精含量估算，但在此案中却没有估算。

112. 尽管 Fleming 先生认为，当时的毒理学检测不是最佳的，但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飞行员摄入毒品或酒精导致坠机的假设。

113. Pollanen 先生在给我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他的观点，即没有任何医学或科学依据认为酒精是坠机的诱发因素。Pollanen 先生指出，他无法独立评估样本的保管链，但不能据此就一定得出否定性推论，因为在此类报告中通常都是这样。不过，他表示认为，鉴于尸体解剖的质量很高，病理学家的意识也很强 (如他们的报告所示)，分析显示未发现 (乙醇) 酒精的结论是合理的。

114. 仔细审查上述所有信息后可以看出，根本没有任何充分证据可据以可靠地证实所谓机组人员饮酒 (或吸毒) 对这一死难事件起了任何作用或产生了因果影响。考虑到最初的医疗报告 (包括其毒理分析结果) 及独立专家 Fleming 先生和 Pollanen 先生的意见，我评估认为，指称飞行员身体功能受损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无”。

五. 其他新资料

A. 地方官员和当局的行为

115. 从联合王国收到的新资料表明，其秘密情报部门 (军情六处) 的一名成员相关时间身在加丹加。在我收到的文件中，至少有三封 1961 年 9 月 17 日 Alport 勋爵给联邦关系事务部的信提到在索尔兹伯里的英国高级专员署一等秘书 Neil Ritchie，据认为，包括独立小组也认为，此人是军情六处特工。

116. 早期的调查没有提及外国情报机构的存在。威廉姆斯女士在 2011 年最先多次提到 Ritchie 的角色,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审议了她提到的这些内容。这一信息的来源是埃塞克斯大学保存的 Alport 勋爵的文件档案, 其中包含一份文件, 题为“Neil Ritchie 给 Alport 给 Sandys 的秘密报告, 附录 A, 特电第 8 号, 1961 年 9 月 25 日”。联合王国提供的现有资料似乎是它首次明确承认存在军情六处特工, 如果真是这样, 这将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联合王国的其他文件在似乎是提及 Ritchie 之处做了删改, 但既然现已确认他的存在, 现在或许应该审查其他案文对他的名字或提及他的地方所做的删改。对倾向于证实 1961 年 9 月在加丹加及周围存在外国情报资产或人员的新资料, 我评估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

117. 我还收到新资料, 似乎表明一些会员国的代表或许曾试图对早期调查施加影响, 使其认定飞行员失误是导致坠机的原因。在我就任当前职务之后引起我注意的一个例子是, 在 1962 年 4 月 24 日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Alan Campbell 给外交部 Michael Wilford 的信中, 多次提到联合王国在 1961 年委员会报告印发之前得到了报告草稿, 他承认“披露这一事实有着某种微妙含义”; 信中还提到联合王国谈判修改了报告案文。信中说,“我想秘书处现已对草稿作了令人满意的修改”。信中提到联合王国力图让 1961 年委员会秘书就草稿做出的具体修改(在本例中, 修改之处涉及与英国高级官员 Lansdowne 勋爵和 Alport 勋爵有关的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证据)。从我们得到的 1961 年委员会报告的最后案文来看, 联合王国要求的至少一项修改似乎被纳入了最后报告的案文。

118. 在 Campbell 给 Wilford 的同一封信中谈到一名专家提供了一种意见, 即“坠机不可能是因人为破坏或被射击而造成的”; 就此, Campbell 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决定坚持自己的草稿”, 而不是改变其结论, 接受关于排除人为破坏或外来袭击的建议。Campbell 还指出, 就关于飞行员失误以外的其他原因导致坠机的任何暗示,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如果报告正文对人为破坏或其他恶意行为的可能性不做定论, 一旦报告公布, 出现任何再次提出这些指控的倾向时, 我们就可以指向[专家的]报告”。我注意到, 联合王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的意见是通过正式信函而不是个人信件的方式转达的。这一材料和其他材料均表明, 曾试图对 1961 年委员会施加影响, 以排除人为破坏或其他恶意行动是飞机坠毁的可能原因或原因。

119. 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三名成员中的一名也曾对 1961 年委员会直接施加影响。在 1962 年 2 月 19 日 Lloyd-Jacob 法官给联合王国国务大臣 Home 伯爵的一封信中, Lloyd-Jacob 法官说,“我希望你对联合国委员会可能做出的结论不会太过担心。我想委员会成员将(在与其中两人私下讨论时, 我敦促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刚果的飞行前状况, 寻求解释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随意的安排来运送如此重要的乘客”。独立小组报告发布后, 公布了当时的联合国记录, 其中显示, 给 Lansdowne 勋爵和秘书长做的飞行安排不是正常安排, 而是在“最高级别”做出的。Lloyd-Jacob 法官告诉 Home 伯爵,“就坠机的因果关系问题, 我期望他们(即 1961 年委员会)同意我们的调查结果”。1961 年委员会的结论没有同意这一结果,

而且尽管受到敦促，委员会决定在报告草稿中的某些部分坚持自己的案文。因此，我评估认为，就证实试图施加影响的行为对 1961 年委员会的独立性真正产生了影响而言，关于 Lloyd-Jacob 法官的信的新资料其证明价值为“弱”。

B. 搜索和救援

120. 从联合王国收到的某些新资料表明，发现坠机现场的时间早于官方报告的 1961 年 9 月 18 日当地时间 1510 时。1961 年 9 月 28 日联合王国驻刚果大使 Derek Riches 在给 Home 伯爵的信中说，“秘书长的飞机大约在午夜时分飞过了恩多拉。控制塔随后与之失去联系。在组织了大规模搜索后，于 9 月 18 日中午发现了飞机残骸”。这一信息本身可被解释为仅仅是一种不确切的记忆或重述。但是，独立小组审查的证据，包括 Alport 勋爵和他的私人秘书 Brian Unwin 单独做的陈述，也表明残骸至少是在当地时间 1510 时之前的几个小时被发现的。Riches 的说法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结论。我评估认为，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C. 截获通讯

1. 密码机被动了手脚

121. 曾有人向独立小组宣称，国家安全局利用加密环节中的“后门”，监测哈马舍尔德访问刚果期间使用的 CX-52 型密码机发送的讯息，并同中央情报局和政府通信总部、可能还与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分享情报。这项资料是 CX-52 型密码机瑞士制造商 Crypto AG 的创始人 Boris Hagelin 的妻弟 Sixten Svensson 提供的。Svensson 还告诉哈马舍尔德委员会，Hagelin 在回忆录中就此做了全面详尽的记述，但这些回忆录计划最早于他死后 50 年，即 2033 年出版。独立小组评估认为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122. 在独立小组结束工作后，Svensson 出版了一本有关这件事情的书，但没有英文版本。我联系了 Svensson，想了解关于这一问题是否有新资料。他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与他以前提供的信息一致。在小组结束工作后、但其报告发表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安全事务通讯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家安全局和政府通信总部如何暗中监视冷战世界”。文章描述了据称 Hagelin 与国家安全局代表 William F. Friedman 之间的关系性质。它没有直接断言国家安全局有“后门”。文章作者声称征求了国家安全局的评论意见，但后者拒绝发表评论；还征求了政府通信总部的意见，据称后者答复说，它“不对其业务活动发表评论，关于从你所讨论的文件中得出的具体推论的准确性，既不确认也不否认”，但同时指出，“应将这些文件……放在联合王国、美国及其盟友同苏联集团之间有可能出现公开敌对这一背景下加以解读”。

123. 此外，根据美国在卢萨卡的驻地领事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是在 1961 年 9 月 27 日从美国驻索尔兹伯里领事馆递送国务院的)，英国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奇怪地……拒绝将联邦当局在残骸中找到的密码机和书籍交还联合国代表”。Alport 的行为表明，他是出于某种原因拒绝将联合国财产，包括哈马舍尔德的 CX-52 归还联合国，尽管最终还是还了。

124. 我在 2017 年的调查中曾请美国就据称哈马舍尔德的 CX-52 型密码机发送的讯息被美国或其他国家截获一事发表评论。我收到答复称，美国“对此无可奉告”。根据新资料，包括现已出版的 Svensson 的著作以及最近来自美国政府的回应，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独立小组的结论，即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2. 在恩多拉的美国 Dakota 飞机

125.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审查了 1961 年 9 月 17 日夜晚在恩多拉机场停机坪上的美国飞机截获或听到有关坠机的通讯的可能性。这一资料并不完全是“新”的，因为其中一些内容在最早的调查之后就一直记录在案。不过，2015 年以来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它现在能确认关于存在这些飞机的记录，从而使这一“新资料”符合前述定义。

126.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从英国外交官 Brian Unwin 那里获得了关于这一事项的证据，他是英国驻罗得西亚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的私人秘书，当时在恩多拉。Unwin 说，他记得 1961 年 9 月 17 日在恩多拉看到两架美国空军飞机，并补充说，据他所知，这些飞机“配有高功率的通讯设备，后来我们的确琢磨过，是不是其中哪架或两架美国飞机在跟哈马舍尔德的飞机进行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有能力与哈马舍尔德的飞机联系”。Unwin 的回忆与皇家罗得西亚空军中队长 John Mussell 在 1961 年和 1962 年所做的陈述没有什么不同。当被要求就其所说的“在[恩多拉]机场有神秘事情发生”做以澄清时，Mussell 对 1961 年委员会说，“大概在那个时间，机场上停有美国的 Dakota 飞机。它们就停在那里，引擎一直在转，大概是无线电在转播各种事情，比如重要人物抵达等等”。Mussell 后来承认，用“神秘”一词描述此事可能不正确，但他没有改变关于有“美国 Dakota 飞机”存在的说法。

127. 独立小组要求美国提供关于两架美国空军飞机以及它们可能听到或传输任何信息的资料。截至小组结束工作，没有收到任何答复。2016 年联合国跟进询问此事，被告知“美国空军进行了搜寻，没有发现任何关于 1961 年 9 月恩多拉机场停机坪上有美国空军飞机的文件或资料。”

128. 鉴于美国 2016 年的答复，我再次审查了早期调查记录。罗得西亚调查局的记录载有美国空军驻比勒陀利亚的武官 Don Gaylor 中校和美国空军武官 Ben Matlick 上校的陈述。Gaylor 的陈述包括这句话：“9 月 17 日星期日晚上，我的 DC3 飞机 8866 停在恩多拉机场”。Matlick 的陈述包括以下内容：“9 月 18 日星期一当地时间大约 0915 时，我收到无线电指示[从伊丽莎白维尔]飞往恩多拉，指挥在恩多拉或正派往那里的美国空军飞机。这将是两架 DC3[Dakota 飞机]，我自己的 DC3 和两架 C54 空中救援飞机正从 Kano 调往 Wheelus”。因此，1961/62 年时似乎就已证实，9 月 17 日至少有三架美国空军 Dakota 飞机在伊丽莎白维尔或恩多拉，这三架飞机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前都在恩多拉。当然还可能还有其他飞机。

129. 我在 2017 年的调查中请美国审查其记录，以求澄清两种说法之间的明显不一致，即美国在 2016 年声明说美国空军没有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在恩多拉有任何飞机的记录，而 Matlick 和 Gaylor 却说那里有飞机。2017 年 6 月，

我收到答复和记录,表明美国国务院已经找到记录,显示 1961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之间,在恩多拉有一架美国陆军和海军武官的飞机,9 月 15 日至 17 日在伊丽莎白维尔有两架飞机(一架是美国空军武官的飞机,一架是美国驻比勒陀利亚武官的飞机),这两架飞机在 9 月 18 日调至恩多拉。因此 1961 年 9 月 18 日在恩多拉地区至少有三架美国飞机。美国的答复进一步阐明,“1961 年 9 月美国飞机在恩多拉……是与那段时间刚果正在发生的危机有关,并与关于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乘坐的飞机坠毁的报告有关”。

130. 卢萨卡的驻地领事在其报告(未注明日期,是在 1961 年 9 月 27 日转交国务院的)中说明,利用美国空军武官(Matlick)的飞机上的“单边波段”无线电协助 Matlick 将来自恩多拉的通信传送到伊丽莎白维尔、利奥波德维尔和华盛顿特区。这表明美国代表拥有高性能的无线电设备,足以从恩多拉直接与华盛顿特区通讯联系。罗得西亚和联合王国当局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研究员 Simensen 提醒我注意的 1961 年 9 月 25 日英国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给国务大臣 Sandys 的信中,有以下评论:“属于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和比勒陀利亚的空中武官的飞机在恩多拉机场停机坪上停留多日。在未向联邦当局披露事实的情况下,这些飞机持续与利奥波德维尔、伊丽莎白维尔、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联系,并不时与空中的联合国飞机联系。它们的活动引起了联邦安全当局的怀疑,曾经有一度联邦政府几乎想让北罗得西亚警察逮捕美国上校,指控其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法”。此外,在描述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的事件时,Alport 指出,“我们认为这架[Dakota]飞机有可能在与[SE-BDY]利奥波德维尔飞机进行通讯联系”。

131. Gaylor 叙述称,“1200Z[恩多拉当地时间 1400 时]之后,这架飞机没有与任何其他传输站进行无线电传输,直到我在 9 月 18 日星期一参加搜寻 DC6/SE-BDY”。但是,Gaylor 的说法不涉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前几段提到的其他两架 Dakota 飞机可能发出了讯息,或者三架 Dakota 飞机中的任何一架(包括他自己的飞机)可能收到或截获了通信,或充当其他无线电(推定是甚高频)通信的中继站。事实上,Matlick 对事件的叙述表明,至少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Dakota 飞机“与在恩吉利机场的美国空军通信分遣队”有通信联系。该分遣队由美国空军人员在离利奥波德维尔民用航空信息中心大约一英里的地方运作,位于刚果另一侧,当时 Matlick 正在那里。

132. 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恩多拉周边相关地区是否有可能进行了雷达或无线电监控,我也征寻了 Hammarberg 的意见。Hammarberg 指出,有资料表明一架美国 C-47 飞机[Dakota]当时在恩多拉空军基地,可能会被用作该地区任何甚高频传输的录音站和(或)中继站(“实地指挥所”)。他还指出,他认为在事件所涉时间,有关国家的情报组织极有可能通过信号和通讯情报(信号情报/通讯情报)在恩多拉地区收集信息。

133. 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来证实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伊丽莎白维尔和恩多拉的美国飞机总数,但那里似乎至少有三架配有功能强大的无线电设备的 Dakota 飞机。书面记录,包括 Alport 勋爵、Mussell 和 Unwin 的意见(前两者几乎是同时发表的意见,后者是近年来发表的)以及美国在卢萨卡的驻地领事最近透

露的信息，连同 Hammarberg 给出的专家意见，强烈表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在恩多拉和伊丽莎白维尔确实存在美国飞机，包括 Dakota 型飞机，因而当时美国有资产能力传输、接收、中转和截取通讯。我评估认为，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134. 不应将美国在该地区有这种资产这一事实本身视为恩多拉的无线电空中交通通讯或 SE-BDY 驾驶舱的通讯确实被这些飞机或其他飞机收到、传输或截取的证据。目前的资料情况仍然是，没有证据表明从 SE-BDY 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当地时间 1751 时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到当地时间 2202 时它第一次打破无线电静默状态，通过高频无线电告知索尔兹伯里飞行信息中心其预计抵达恩多拉的时间为 0035 时(当地时间)的这段时间内，SE-BDY 发送或接收了任何通讯。但是，如果有空难发生的夜晚 SE-BDY 发出或与之进行的通信、或空中交通调度员发出或接收的通信、或是空中或地面的任何其他无线电发出或与之进行的通信的任何录音或录音抄录，都将是非常关键的材料。

3. 截获其他通信

135. 从美国收到的文件显示，美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在 1961 年 1 月 5 日的电报中向国务院报告说，英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给[他]读了截获的在 Albertville 的尼日利亚联合国指挥官、英国准将 Ward 发出的电文，内容是向[联合国代表]Dayal 报告 Ward 与巴鲁巴人领袖会晤的情况”。该电报提到“截获的尼日利亚联合国指挥官在布卡武的副手、英国军官给[联合国代表]Dayal 和 Ward 的电报”，并向国务院提供了电报内容。

136. 从联合王国收到的文件有多处提到截获联合国的通信。在 1961 年 10 月 12 日 Alport 勋爵给联邦关系事务部的一封信中，提到“联邦当局通过截取通讯获得了关于据称联合国违反停火的证据”。Alport 勋爵说，他看到了其中一些截获的通信，而且得知“联合国的所有信号……目前都用密码传输”，罗得西亚和联合王国当局显然能够破译这些密码。

137. 在 1961 年 10 月 13 日的信中，外交部向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传达了从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总理 Roland Welensky 收到的一个讯息，其中详细说明了通过“无线拦截”和“信号拦截”获得的联合国部队的军事行动。Welensky 还说，“引述的例子 100% 真实。我们有更多同等真实程度的例子”，并强调指出，“实际截获的讯息，除第一条外，不应传递给联合国当局，因为我们当然不希望披露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这些截获的通信包括联合国总部加丹加指挥部给在利奥波德维尔的空中行动发出的讯息。在同一天从索尔兹伯里发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一份类似的通信中提到，“政府准备公布截获的许多讯息中的一例[1961 年 9 月 24 日的]。根据其他通信，Welensky 也公开表示他在截取联合国的传输讯息。

138. 上述内容似乎证实，1961 年时罗得西亚和联合王国当局在刚果拦截了联合国的通信，且可能与美国分享了情报。我评估认为，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139. 第三方在刚果和恩多拉拦截联合国通信的任何行动都令人关切。但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可能拦截了有关秘书长访问恩多拉的旅行安排以及有关活动的通信。

如果这些通信确实被截获或以其他方式获取，那么联合国为保证这一行程的机密性而做的努力(包括 Hallonquist 上尉提议提交一份目的地为 Luluabourg 的假飞行计划)便前功尽弃了。这种拦截联刚行动通信的行为也意味着此次飞行在途中有可能遭遇恶意或敌对行动。我只想指出，尽管早些时候我曾将某些会员国拦截联刚行动通信的可能性的证明价值评定为“中”，但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证明 1961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秘书长在利奥波德维尔期间的通信或与此次致命飞行有关的通信被第三方截获。

140.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分析确定，Tore Meijer 是隶属帝国埃塞俄比亚空军的瑞典籍飞行教练。他说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他听到机场控制塔人员用英文说，“他正在接近机场。他在掉头。他在拉平。另一架飞机从后面过来了。怎么回事？”，随后传输中断。Meijer 说，他听到这段话的时间大约是 2200Z，即恩多拉的大约午夜时分。他说他试图把听到的情况告知埃塞俄比亚空军负责人、他认识的美国人和刚果泛航航空公司总工程师 Bo Virving，但未果。后来他在 1994 年向一名记者讲述了此事。我在工作中做了非正式问询，试图确定 Meijer 手中是否仍有相关记录。我未能联系上可能予以协助的任何人。但我记下这件事，今后若开展调查，应予以跟进。

D. 其他

1. Dane/Dubois

141. 2017 年 6 月我获得资料提到一种说法，即一个以 John Dane/Paul Dubois 为名字开展活动的前雇佣兵参与了 1961 年破坏哈马舍尔德飞机的行动。1975 年，“John Dane”接受一个名为 Tom Miller 的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在访谈中他似乎宣称他的“加纳加名字”是 Paul Dubois，原来是英国国籍，曾在罗得西亚和刚果等地当过雇佣兵。1976 年，Miller 所写的关于 Dubois 的文章出现在《滚石》杂志上，据说有关 Dubois 的一部分内容曾在那一年的“60 分钟”电视节目中播放。

142. Miller 愿意提供帮助，给我发了材料，但他说他已有大约 40 年没跟 Dubois 有个人接触。根据我收到的 1975 年 Miller 与 Dubois 的会谈笔记所述，针对 SE BDY 的阴谋涉及伪造导航图，显示恩多拉的海拔低于实际高度，以及在机身中放置一个燃烧装置，定在 4 500 英尺高度时引燃。关于导航图，笔记内容显示，“所有海拔均调低 1 000 英尺……最后近地高度应是 6 000 英尺，但最后图示却降至 4 500 英尺”。关于燃烧装置，Dubois 明显指出，将“铝热剂”放在了燃料线旁边，是通过飞机的内部出入舱口放进去的。据说“铝热剂”是“硫酸滴在氯酸钾和糖的混合物上……[这]进而点燃氧化铁和铝粉”，当飞机的飞行高度降到 4 500 英尺时，波纹管里的酸剂被压碎，初始阶段点燃，就应导致起火或爆炸。

143. 我注意到，“Paul Dubois”这个名字显然与据说 1961 年试飞第一批 Fouga 喷气式飞机中的一架飞机抵达加丹以测试其性能的法国飞行员同名同姓。此外，有关 SE-BDY 可能使用了不正确导航图的问题在以前的调查中也曾被提及。关于这个问题，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注意到 Hammarberg 的看法，他指出“在找到的杰普森手册中没有看到恩多拉[导航]牌，对此最好和最自然的解释是，坠机时它们

被放在飞行员面前(它们应在那里)”。没有任何新资料向我表明使用了不正确的导航图,我同意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显然结论,即使用的导航图是正确的。关于声称的燃烧装置,正如独立小组所指出的,不能基于没有(例如)易燃材料的痕迹就彻底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因为并没有对所有残骸材料进行检测。但是,由于我无法找到 Dubois,也无法在既定时间内以其他方式开展进一步调查,关于这一所谓阴谋的信息仍然是道听途说。考虑到不正确导航图的说法没有根据,缺乏佐证资料来支持这一孤证,加上证据的传闻性质,我评估认为,这条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2. 其他

144. 在我工作过程中,有一个人联系我,声称其小组发现了据称新的重大证据,他们计划为商业目的公布这些证据。此人说可以给我看这些资料(但不能交给我),前提条件是我对此严格保密,在我的报告中不披露该资料,也不以其他方式在2018年商业公布之前予以披露。鉴于提出的这些条件违反我的任务规定,也不符合以透明方式寻求真相的要求,我无法同意。我再次要求对方给予无条件的合作,但遭到拒绝。

145. 因为没有得到实际资料,我当然无法评估该资料是否有任何证明价值。尽管如此,为了做到充分披露,我提及此事。我还想指出,这个人说,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国家电视公司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资金。如果属实,这或许应引起关切,因为这违背透明、独立地寻求真相的要求。我认为相关会员国应就此采取后续行动。

六. 调查结果和结论

146.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会第 71/260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要求我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鉴于这些结论构成我提出建议的部分依据,我在本节阐述结论,之后再提出建议。本报告,包括其结论,只是寻求全面真相进程的一部分。我认为可能有更相关的材料仍未披露;因此,应根据进一步的资料可能揭示出的信息,对本报告所载结论加以调整。

147. 在独立小组结束工作后的大约两年时间里出现的新资料主要集中在小组审查的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四个领域,即:(a) 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b) 人为破坏;(c) 人的因素;(d) 官员和地方当局的活动。就这些领域现在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在阐述这些结论之前,我想提出初步意见,即会员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可能具有相关性的新资料仍未披露,这是了解这一事件全部真相的最大障碍。我在下文中还会提到这一点。

A. 最初调查的不足之处

148. 本报告无意对早期的正式调查妄加评论,也不想改写调查结果。但是,由于新资料涉及到这些调查的证据、程序和结果,我的任务规定允许我重新审视这些调查。1961/62 年的最初调查意义重大;然而,为支持每一项调查结论而开展

的工作存在某些明显缺陷。关于罗得西亚调查局，由于其开展工作的时间短暂，因此向其提供的材料有限。随后的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似乎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认为事故可归咎于飞行员失误。事实上，在审议是否可能有另一架飞机介入时，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一开始便指出，“首先我们要说，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我们也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能力从空中袭击这架飞机的人真的想要袭击这架载着哈马舍尔德先生去执行使命的飞机”。我尊重委员会的工作，但似乎有理由指出，这种从一种假设出发预先设定的偏见不利于对事件进行真正公平的审查。关于 1961 年委员会，尽管它以更开放的方式审议问题，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罗得西亚调查所收集和证据，这些证据中的某些缺陷便转而纳入了 1961 年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14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调查中，听取证人证词的方式存在缺陷。罗得西亚调查局只要求大约 130 名证人提供简要陈述，并不要求证人亲自出面作证，也没有记录为什么对某些证人做了后续跟进提问，对其他证人却没有。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逐字记录了大约 120 个证人的证词；然而，与其前任一样，它认为被其称作“非洲”证人的证词可信度极低，因而未予充分重视。它审查证人的方式似乎受到飞行员失误这一结论的影响，而这一结论显然也是它力图得出的。

150. 1961 年委员会总体来讲似乎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听取广大证人证词的渠道，例如，给当地证人提供设施将内容译成当地语言，但在处理证人证据的方式方面存在问题。例如，1961 年委员会似乎不适当地过分依赖一份十分令人怀疑的证据报告，该报告是咨询顾问 Hugo Blandori 1962 年 2 月 21 日编写的，他建议对非洲证人的证词“须保持怀疑”。决定证人可信度的不应是族裔或种族。对当地目击者的证据几乎干脆否定，这可能导致早期调查对关于坠机的各种可能假设没能做详尽无遗的审查，从而失去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机会。此外，1961 年委员会对从罗得西亚调查中接收过来的证据通常不太做分析或严格审查，例如，它似乎未经彻底分析便接受了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即说看到或听到第二架飞机的“非洲”证人是出于反罗得西亚联邦的强烈政治动机才这么说，尽管它自己也认为，至少“其中有几个证人对他们相信他们看到的事情所做的陈述是真诚的”。希望 1962 年以来开展的工作使得这些证人对有关事情的描述得到了更充分的倾听。

151. 早期调查也似乎迅速否定或低估了唯一的第一手证人 Harold Julien 中士的证词。记录显示，他在 9 月 18 日几乎一住进医院便做了陈述，内容包括“它爆炸了”，“速度极快，速度极快”，“然后就坠落了”，“到处都是小爆炸”，“我拉了应急栓往外跑”，“[其他人]就被困在里面”。当夜晚些时候，Julien 显然向一名护士重复了这些内容，他告诉护士，“我们在跑道上，发生了爆炸”，“我们在跑道上，哈马舍尔德先生说，‘回去’，随后就爆炸了”，“只有我出来了，其他人都困在里面”。据报 Julien 后来还说，飞机坠毁前哈马舍尔德本人说“掉头”或“回去”。Julien 后来又谈到“天空中有火花”；救治他的罗得西亚医生将此归因于可能是尿毒症的症状表现。

152. 虽然有些证人说 Julien 有时神志不清、语无伦次，别的证人说在其他时候他神志清醒、语义连贯。对于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有时甚至是被注射了大量镇定剂的人，出现这些混乱表现也许不足为奇。尽管如此，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对据称 Julien 所说的话全都不予采信。委员会审查了他的每条陈述，当即予以否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有关“天上的火花”这一说法的处理，对此它不加分析地指出，“无需注意……这要么是坠机之后起火，要么是他当时身体状况的一个症状表现”。或许是因为依赖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1961 年委员会对 Julien 的证词陈述与坠机原因之间有何种联系根本没予重视。如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所指出的，这种对 Julien 的陈述可能具有的相关意义拒不考虑的做法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在 27 名能为 Julien 做证的证人中，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只听取了其中 8 人的证词，而 1961 年委员会听取了这 8 人中的 5 人的证词。这些来自在飞机里亲历坠机过程的唯一证人的陈述未经进一步分析便被否定了。这对证据采集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我看来，不考虑可能相关的证据是一个重大失误。

153. 总的来说，早期调查没有对以下方面的证据做出可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评估：在 SE-BDY 接近恩多拉时有人看到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飞机触地之前已着火；飞机可能受到攻击或外部干扰。事实上，1961 年委员会在做出存疑裁决时也认为，尽管有证人的所有证词，但“没有证据支持”“坠机可能是躲避行动所致，或是来自空中或地面的攻击或佯攻造成飞行员瞬间注意力分散所致”。我在下文中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早期调查没有考虑会员国或其他方面是否有可能拦截了无线电通信，这也让人感到惊讶。下文对此也将做进一步讨论。

154. 如第五节所述，显然至少有一个会员国的代表曾试图影响早期调查，使其认定飞行员失误是坠机原因。在 1961 年委员会报告的最后文本中，联合王国要求的至少一项修改似乎被采纳了。其他资料表明，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三名成员中的一名，即 Lloyd-Jacob 法官也试图影响 1961 年委员会，使其只集中考虑坠机事件的某些方面。Lloyd-Jacob 法官似乎希望安抚联合王国国务大臣 Home 伯爵，他在信中告知后者，“关于坠机的因果关系问题，我期望他们[即 1961 年委员会]会同意我们的调查结果”，即可以排除人为破坏或其他恶意行动。公平地说，由于委员会的结论没有体现这一结果，不能说这一试图施加影响的行为影响了 1961 年委员会的独立性。

155. 我没有审查个人或政府是出于什么原因设法影响早期调查，包括 1961 年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好意或是诚实的信念。此外，我提及前几段中所述的事项，并非是想单独挑出任何一个会员国说事；我只是想说明在我的工作过程中获得的资料必然有限。但是，从做记录的角度考虑，应该记下这些问题。我可以高兴地说，在我担任独立小组前组长和现任知名人士期间，会员国代表对小组和我一直给予包容和支持，最大程度地尊重我们任务的独立性。

B. 坠机原因

156. 要了解坠机原因，或许最好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某种形式的干扰（“外部干扰”系指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部威胁；“内部干扰”指人为破坏），一类不涉及干扰。对可能的“人的因素”将单独考虑。

1. 外部干扰：有理由认为外来袭击或威胁是坠机的原因

157. 1961 年委员会没有发现证据表明 SE-BDY 受到空中袭击或骚扰，但不能排除发生了这种袭击的可能性。独立小组指出，“1961 年 9 月 17 日晚上和深夜，恩多拉地区没有雷达监测，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出现‘不明飞机’的可能性”。小组评估了新资料，认为目击者陈述、据称拦截通信传输以及关于 1961 年加丹加省政府空中能力和军事人员的补充信息具有中等证明价值，可以为查找更多资料提供明显线索。我在工作中跟踪了每一条线索。

158. 2017 年，我没有试图再去约谈目击证人，因为我注意到独立小组评估认为，“对居住在赞比亚的仍在世的目击者做进一步问询不会获得什么信息”。不过，我确实收到了以下方面的进一步资料：Abram 所说他听到的拦截通信；据称“Beukels”拦截了 SE-BDY；加丹加部队进行空中袭击的能力。

159.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似乎有理由认为，来自飞机外部的敌对行动是飞机坠毁的一个原因，无论是直接袭击导致坠机，还是飞行员感受到威胁而瞬间分散注意力，飞行过低导致坠机。根据 Da Costa 和 Hammarberg 提供的专家证据，在飞机下降时，袭击或其他干扰只需使飞行员分散注意力几秒钟就可能导致致命后果。由于存在各种限制，包括夜间飞行没有雷达，对 SE-BDY 实施袭击是很难操作的。但是，现已证实有飞机和飞行员能够对 SE-BDY 执行这样的行动。显然那天夜晚哈马舍尔德将前往恩多拉的消息事先已广为人知，1961 年委员会收到多名证人的证词说，新闻广播了这条消息。许多目击者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看到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另一架可能是喷气式飞机，SE-BDY 坠毁前已着火，SE-BDY 遭到枪击或被另一架飞机以其他方式进犯。综合来看，这些证据不容否定。此外，会员国尚未充分确定他们的记录中可能有什么资料，这本身就成为这一事项中的一个重大事实。

(a) 目击证人提供的信息

160. 自 1961 年委员会结束工作以来，总共约谈了 12 名新证人。询问这些新证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在罗得西亚调查中作证，也没有向 1961 年委员会作证，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要么不知道当时正寻找证人，要么是害怕受到某些形式的指责。有一些新证人是私人研究人员约谈的，哈马舍尔德委员会 2013 年约谈了 7 人，独立小组 2015 年又约谈了其中的 6 人。

161. 独立小组考虑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收到的视觉识别证据是在事发多年之后，由九名 80 多岁的当地证人提供的。其中几人(Ngongo、Custon Chipoya 和 Moses Chimema)是烧炭人，事发夜晚，他们正在坠机地点附近的森林中看窑。独立小组列出了评估证人时所依据的相关客观因素，包括在不利的夜间情况下视觉识别的可靠性和正确性、是否有机会进行观察、人的记忆力随时间减退、不一致和矛盾之处等等。小组评估认为，这些证人提供的信息的证明价值为“中”，这些信息趋向于证明在 SE-BDY 接近恩多拉时，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SE-BDY 以外的任何飞机是一架喷气式飞机，SE-BDY 触地前起火，SE-BDY 遭到一架或多

架其他飞机枪击或以其他方式进犯。独立小组还评估了同样年事已高的三名证人的证据，认为其证明价值为“无”。

162. 罗得西亚调查局收到证据称，有 7 名证人看到第二架或第三架飞机，其中一些人描述的情况表明 SE-BDY 遭到了袭击。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拒绝听取所有证人的证词，但听取至少 6 名证人谈到有不止一架飞机。它对这些证人往往更苛求，与对待没说看到第二架飞机的证人的方式不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可能与其预先设定的偏见有关。1961 年委员会也听到至少 6 名证人谈到有不止一架飞机，至少 12 名证人谈到空中有类似火花的东西。最近，独立小组听到 5 名新证人说看到不止一架飞机(还有 7 名证人声称飞机坠毁前着火)。如上文所述，一名坠机生还者，Harold Julien 提供的证词也显示飞机接近恩多拉时遇到威胁或袭击，可能涉及突然爆炸。

163. 并非只有这些证人当天晚上知道这些事情。从美国收到的资料，即 9 月 18 日 Gullion 给国务院的两份通信描述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份通信说飞机“可能被击落”，第二份讨论了关于“空中有火花”的报告。根据这些通信，上述一条或两条情报也立即传给了白宫、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值得注意的是，身在当地的美国大使的第一印象是坠机是由敌对行动造成的。

164. 总的来说，有充分数量的相关目击者证据倾向于证明，在 SE-BDY 接近恩多拉时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在 SE-BDY 以外出现的任何飞机是一架喷气式飞机，SE-BDY 在触地前起火，SE-BDY 可能被一架或多架其他飞机枪击或以其他方式进犯。随着记录不断充实，需要进一步审查这些证据，并根据从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获得的资料(希望不久后能获得)进行评估。

(b) 声称侦听到有关袭击的通信

165. 独立小组认定 Charles Southall 和 Paul Abram 的证词的证明价值为“中”；此二人分别说，他们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听到了截取的无线电通话或看到了通话抄录，据其认为内容涉及对 SE-BDY 的袭击导致其坠机。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的报告对这两人的说法做了更充分阐述。

166. 回顾有关 Southall 的资料，他说 1961 年时他驻在国家安全局设在 Nicosia 附近的一个通讯设施，担任“处理和报告”官。他一直说，他听到或读到了以下内容：“我看见一架运输机在下降。所有灯都亮着。我要下去对付它了。没错，就是泛航 DC6。就是这架飞机。我击中它了。着火了。它在往下掉。就要坠毁。”他说这段通话是中央情报局截获的，但传给了他和其他四五名人员所在的国家安全局工作区，当时他听到了录音或看到了录音抄录。Southall 还说，他的通讯侦听官或另一个当时在场的军官告诉他，这段通话来自一个绰号为“独行侠”的比利时飞行员，他当时驾驶着一架加丹加部队使用的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而且“一定是在等待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应回顾指出，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 Gullion 也提到过“独行侠”和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

167. 我在工作过程中遗憾地获悉，Southall 在独立小组完成工作后去世了。还可回顾指出，美国在 2016 年确认他于 1955 年加入海军，1969 年免服现役，1978 年作为指挥官从海军预备队退役。关于 Southall 的陈述，没有从美国收到进一步资料，包括没有就独立小组关于 Southall 是否如其所述曾驻扎在希腊或是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的询问做任何回应。尽管 Southall 去世了，美国仍有可能对这些方面做出确认或否认。

168. 关于 Abram 的陈述，应回顾指出，他也说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他听到关于在刚果附近击落一架飞机的通话。当时他驻在希腊 Irakleio(克里特)的一个国家安全局监听站。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美国告知它没有任何关于 Abram 的记录。如上文所述，美国最近提供了似乎是服务记录的文件，证实 Abram 确实曾为空军服务，在克里特岛美国空军安全部门担任侦听专家。美国称它提供的文件也证明 1961 年 9 月 Abram 不在克里特。Abram 对此提出质疑。

169. Southall 和 Abram 的陈述与 SE-BDY 是否可能遭到了某种形式的攻击的问题密切相关。美国现已确认，他们两人都曾在美国军方工作，Abram 曾在情报部门工作。然而，就这条信息存在相互抵触的说法和未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这两名军官当时担任的职务、其在有关工作地点的确切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声称的就他们所述听到的内容有磁带录音或其他记录并被送交美国(Abram 说是送给了联合王国)。看来美国应该至少还能找到一些记录，从而帮助合理解决这一问题。

(c) 实施空中袭击的能力

170. 早期调查基本上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认为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唯一可供加丹加使用的攻击机——一架 Fouga Magister 型喷气式飞机——被用于袭击 SE-BDY。这样做的依据是，他们认为由于燃料装载量的限制，Fouga 不可能先到达恩多拉再返回科卢韦齐。早期的调查还认为，无论如何，Fouga 飞机的“机长”(Delin)和其他人都说，飞机当夜是处于着陆停飞状态。这两项证据都不是决定性的：“机长”Delin 向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承认，至少有一次“Fouga 从一条未铺面的跑道上起飞”，这意味着它有可能使用了科卢韦齐以外的另一个有必要长度跑道的机场起飞或着陆。如本报告所附地图显示，这样的机场有很多。此外，Da Costa 和 Hammarberg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 Fouga 手册提供的证据显示，在任何情况下，Fouga 都有可能从科卢韦齐飞到恩多拉执行战斗任务再返回。尽管科卢韦齐-恩多拉-科卢韦齐这条航线给执行打击任务留下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如果 Fouga 是在距离较近的机场起飞或降落，那么到达恩多拉显然是可能的。此外，对 Delin 提供的证据未做进一步分析便予以采信，这似乎值得怀疑。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认定，“他是自愿提供这一证据的……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证据”。Delin 是加丹加雇佣军，涉嫌共谋参与了这一死难事件；仅因这一点就有足够理由至少对他的动机做一些分析。事实上，Delin 自己的叙述在一些方面前后矛盾，包括有多少飞行员可执行飞行任务，甚至他本人是否是飞行员。后来获得的其余证据，包括来自他的战友的证据表明他不是飞行员。他向罗得西亚调查局和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所做的陈述之间也有相互矛盾之处。

171. 2015 年，独立小组评估认为，在对 SE-BDY 的空袭中有可能使用了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De Havilland Dove 或 Dornier DO-27 或 DO-28 飞机。然而，就其中一架飞机实施了具体可确定的袭击的资料，它认为其证据价值为“弱”，依据是没有其他佐证，同时考虑到夜间实施直接攻击存在操作困难及其他困难和限制。然而，我收到的专家意见再次强调，第二架飞机骚扰或干扰 SE-BDY 而不是击落它，这样更容易。如果在 SE-BDY 接近地面的关键时刻采取这种威胁行动，就可能造成坠机，但不留下任何额外的物证。

172. 我在 2017 年评估的新资料支持独立小组的调查结果，并进一步显示，利用当时该地区存在的资源，是有可能对 SE-BDY 实施空中袭击的。来自联合国档案的新资料表明，除了独立小组最初考虑到的机场外，还有更多机场或简易机场可能被用来实施攻击行动。其他资料证实有多个飞行员有能力实施攻击，而早期调查只考虑了 Delin。此外，可用的飞机数目也比最初确定的多，包括可能有第二架 Fouga Magister 喷气机在运行。如我已分析的专家证据显示，对 Fouga 飞机或其他飞机而言，在夜间起飞、实施攻击再降落是很困难的。不过，在早期调查的证人证词中有描述说，曾用沙子和煤油做道路照明从而使飞机能在夜间降落，而且向 1961 年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当时联合国在刚果的大多数飞行都是夜间进行的。

173. 上述意见涉及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加丹加武装部队有可能袭击或干扰了 SE-BDY。1961 年委员会不能排除、我也不能排除那天夜晚空中有另一架非加丹加飞机的可能性。例如，这可能包括已部署到恩多拉的皇家罗得西亚空军 18 架堪培拉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中的一架、其大约 30 架 Vampire 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或训练机中的一架、或其 12 架轻型攻击机 Provosts 中的一架。这并不是说我有具体证据表明这些飞机中的一架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在恩多拉空中飞行，当然更不是说我有具体证据表明其中一架参与了任何攻击。但是，鉴于事件所涉地区是罗得西亚领空，目前尚未看到所有潜在记录，而且大量目击证人证词表明空中有第二架飞机，因此现阶段尚不能决定性地否定非加丹加的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可能性。

174. 虽然孤立来看，关于 Fouga、De Havilland、Dornier 或其他飞机可能袭击了 SE-BDY 的资料被评估为证明价值“弱”，但必须将其与其他证据，包括证人证据一并加以考虑。此外，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SE-BDY 坠毁不一定是直接袭击和成功袭击导致的；第二架飞机对 SE-BDY 实施骚扰行动就足以导致坠机。

175. 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时，我想指出，Beukels 的陈述与其他证据相符；在我看来，这一陈述仍值得进一步审查。所说的相符之处包括，Beukels 说 SE-BDY 的灯都亮着，Fouga 用了探照灯，这与 Southall 的陈述以及目击者的描述相一致，其中一些目击者说飞机的灯都是亮着的。Beukels 的叙述也符合以下几点：坠机的实际时间；Fouga 的潜在飞行距离；指令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用法文发出的(符合 Southall 的证据以及驾驶舱里可能有讲法语的人 Barrau 和(或)Lalande)；Julien 的说法，即哈马舍尔德说“掉头”。我还想指出，我收到了来自 Hammarberg 的最新意见，他说由于 Fouga 驾驶舱的设计，坐在后座的导航员可以使用无线电传送信

息，同时前座的飞行员可控制飞机并(如声称的那样)实施攻击。Beukels 叙述的内容有许多方面符合已知的事实，但对暗指有两架 Fouga Magisters 飞机参与其中的说法，仍需进行核实和独立确证。最明确的核实办法似乎是审查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是否存在所指称的侦听内容录音。

2. 内部干扰：目前无法断定人为破坏是否是坠机的原因

176. 应回顾指出，早期调查以来对各种形式的人为破坏在坠机事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做了审查。独立小组评估认定，2015 年提供的以下两个说法的证明价值为“无”：一是 SE-BDY 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停机坪停留期间，驻利奥波德维尔的一家外国使馆(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参与在飞机上安放了一个爆炸装置；二是一名劫持者或“额外”乘客被偷运上了 SE-BDY。小组未能充分评估描述“Celeste 行动”的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概述的人为破坏的说法。

177. 1961 年委员会指出，SE-BDY 在利奥波德维尔地面停留时为其安排驻守的一名特别警卫不在位，这意味着不能排除有人未经许可接近飞机以达到破坏目的的可能性。瑞典飞机技术人员也证实，这架飞机曾无人值守，前货舱没上锁。然而，独立小组认为，下令执行目标为“除掉”哈马舍尔德的“Celeste 行动”的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缺乏证明价值，主要是因为未证实其真实性，其过手链不确定，而且不能确定该研究所在 1961 年 9 月时是否存在。我曾希望能评估这些文件的真实性。遗憾的是，我没有获得查阅文件的许可，因此对这一假设，我即无法排除，也无法进一步验证。

178. 我认为没有理由支持关于人为破坏的任何其他说法。因此，目前来看，仍有必要核实关于 Celeste 行动的各种说法，之后才能就人为破坏在坠机事件中的可能作用得出明确结论。仍有必要分析文件原件本身，可能也需要询问证人，并协调一致地审查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是否提到南非海洋研究所或 Celeste 行动(除其他外，据称中央情报局牵涉其中)。

3. 坠机仍有可能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不存在任何干扰

179. 当然仍可以设想坠机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尽管机组人员经验丰富，飞机接近着陆前条件正常。如果我们能确定无疑地说：已获得并审查了所有潜在证据，没有其他任何可能的解释，那么这就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当然，不可能对曾经存在的所有证据都进行检查。这是因为，例如，飞机坠毁后大部分机身已烧毁，无法进行检验；永远不可能得出明确结论，即残骸烧毁前其中没有异物。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如果对现有的所有证据进行了审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其他假设能得到支持，那么就有理由推测，不管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除了飞行员失误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解释。

180. 围绕可能出现的飞行员失误的类型，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而言，是否有其他一些失常是促成因素。有理论认为，可能出现了机械或其他重大故障，包括高度表出问题，给出的设定高度有误，或者使用了错误的着陆图。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在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工作过程中均已被充分否定。因此，如果飞

机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坠毁，几乎可以肯定是单纯的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例如误读了高度表再加上出现视觉错误。

181. 从逻辑上讲，飞行员失误是较易被接受的一个假设，部分是因为其他假设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实施空袭或其他干扰存在难度，尤其是夜间进行空对空袭击；或者就人为破坏的可能性，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 SE-BDY 在利奥波德维尔时只是短时间内无人值守。但是，现阶段要认为最有可能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外部或内部干扰，从逻辑上讲依据不足。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从下文的进一步讨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相关证据。在明知没有看到所有潜在物证的情况下得出任何有结论性的结果，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此外，仍有如此多的证据没有厘清，而会员国持有的资料至少可能对其中一些做出解释；例如，指称侦听到的通话是否存在，是真是假，或者是否有任何安全或情报实体记录出现第二架飞机。

4. 有理由认为人的因素在坠机中起了作用

182. 疲劳等“人的因素”可能对坠机起了作用，无论是否存在其他一些干扰。这些人的因素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误，或限制飞行员应对干扰事件的能力。如独立小组 2015 年指出的，SE-BDY 是 DC-6B 型飞机，非常复杂且操作要求极高，至少需要三名机组人员(两名飞行员和一名飞行工程师)。独立小组认为，如果 SE-BDY 机组人员疲劳，他们犯简单错误或出现幻觉或丧失态势感知的风险就更高。同样，疲劳或其他身体损伤也可能影响机组人员应对和控制不正常或紧急情况的能力，比如应对空袭或外部威胁，或处理人为破坏或技术故障的后果。

183. 独立小组审查了在瑞典有关当局任职的合格工作人员根据 SE-BDY 的运营公司泛航航空公司的记录在当时进行的分析。关于四名机组人员中有三人在 SE-BDY 飞行前似乎没有足够机会得到适当休息的资料，独立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不过，飞行员 Hallonquist 似乎有适当机会休息。我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分析了关于机组人员可能受到酒精或毒品影响的说法是否有证明价值。在审查了收到的专家评估意见后，我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这种影响。综上所述，我认为似乎有理由推定疲劳可能影响了 SE-BDY 副驾驶和飞行工程师的能力，包括在发生任何意外情况时的应对能力。然而，在我看来，根据现有证据，飞行员似乎不可能受到此种影响。

C. 其他事项

1. 肯定存在更多相关资料

184. 仔细阅读记录，包括部分解密资料后，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存在与这一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的某些方面有关的未披露资料。从过去多年来潜在新资料出现的历程和方式看，仍有可能找到、发现或提供更多资料。虽然这会令人感到些许安慰，但并没有解决迫切之需，即填补资料空白以找出全部真相，最终确定坠机的可能原因。相反，目前所需要的，也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是，无条件、无保留地披露可能存在，但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机构或部门迄今一直不予披露的相关资料。

185. 过去两年，对会员国情报、安全和国防资料的了解出现进展。例如，在当前的调查中，美国澄清说明，当时在刚果区域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它提供了外交档案，表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安全和国防机构随时能得到关于政治领域重要事态发展的情况通报。美国还进一步确认，在相关时间它在恩多拉有资产，包括 Dakota 飞机。记录显示，一架或多架 Dakota 飞机有能力拦截通信，且其配备的无线电设备功能强大，足以进行洲际信息传输。此外，美国在 2015 年告知独立小组，“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搜寻，没有发现关于所涉时间在加丹加地区存在 Fouga Magister 飞机的任何文件”。但是，2017 年它向我提供的资料表明，其他档案中的确有大量相关资料，说明存在三架 Fouga 飞机，这也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186. 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是，比利时直接证实在其安全档案中存在相关资料，并公布了某些文件。

187. 德国在给我的回复中提到各类相关资料，包括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的资料。感谢 Gölstorff 先生的研究和协助，我收到了其中一些资料的副本。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似乎对搜寻工作施加了限制，因为在德国的档案中找到的文件明显没有提及 SE-BDY 坠机、哈马舍尔德死亡以及随后的调查。可以不无道理的推断，这些事件在东德和西德内部都令人关注，尤其明显的是，根据 2017 年审查的档案，1961 年 8 月左右，德国在协调当时的刚果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与莫伊塞·冲伯进行尝试性秘密谈判方面发挥了作用。

188. 联合王国首次(就我的理解)提供了来自其档案的资料，与记录在案的资料(包括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的陈述)相互参照便可确认存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特工人员，包括 David Driver 和 Neil Ritchie。这一信息佐证了从一份主要文件，即 1961 年 9 月 25 日 Neil Ritchie 所附报告中收集到的相关信息，那份报告讨论了联合王国帮助安排哈马舍尔德在恩多拉的拟议会谈，包括送冲伯去参加会谈。从联合王国收到的资料直接提及 Driver 和 Ritchie，这证实就在 SE-BDY 坠机之前和之后，有外国情报机构开展活动。这一点没有反映在任何正式调查报告中，但会员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机构的记录肯定有记载。我从联合王国收到资料还显示，1962 年它收到来自罗得西亚的情报报告，其中有些已经解密，包括北罗得西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在现有记录中有可能进一步追查到这些资料，而且不论它们存放在何处，联邦情报和安全局(殖民地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情报和安全部门)的档案中也可能包含更多的相关资料。我没注意到有与已审查的 1962 年报告相类似的 1961 年报告，但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一定包含更多相关信息。另外，如果会员国如指称的那样截取了哈马舍尔德的 CX-52 机发出的通讯，可以追踪截取的信息，以确定是否存在更多相关资料。

189. 因此，显然可以确定在某些领域开展调查，但这至少需要某些会员国积极合作，在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寻找资料。主要的关注领域是截获的无线电信息和有关记录(例如磁带、录音抄录、二级/三级信息及其他材料)，尤其是 SE-BDY 发出的或 SE-BDY 与任何其他飞机、地面部队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之间可能有的通讯。有关 SE-BDY 在最后时刻发生的情况的任何资料，如果可以核料，

将可能证实或否定现有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从而使我们更接近结案。或者，如果全面搜查，包括对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的搜查表明，现在没有且从来没有此种录音或其他资料，那么我们或许能真正得出结论说，除了飞行员失误外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190. 正如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记录所指明的，据索尔兹伯里空中交通调度员说，“[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日志记录不完整，发生的很多事情上面都没有记录”。我们现在知道，肯定存在更多的无线电截获记录和有关记录，这些记录可充实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在坠机 32 个小时后所做的不完善的记录。我审查的一些新资料证明，会员国在刚果截取了联合国通讯，相关夜晚在恩多拉存在有拦截能力的会员国资产，相关时间在刚果和北罗得西亚有多个会员国的情报人员。Southall 和 Abram 的证词及 De Kemoularia 和 Meijer 等其他个人的记录也表明，有可能有通过无线电波传输的相关信息被有关会员国和其他人侦听。如能提供这些录音或其他记录，就可以进一步证实空中管制日志的内容并提高其可信性。

191. 鉴于本报告中所做的分析，我认为似乎可以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现已转移到会员国，它们需证明已对其保管或拥有的记录和档案，包括仍然保密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以找出可能的相关资料。第七节的建议部分将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2.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哈马舍尔德和其他随行人员不是在飞机落地后被刺杀的

192. 关于 SE-BDY 号乘客死亡的原因，独立小组认定，Ross 医生、Smith 医生和 Stevens 医生 1961 年所做的最初尸检的结果和结论具有充分依据。也就是说，当时的资料和新获得的资料均支持这样的结论，即所有乘客因飞机坠毁造成的多处负伤瞬间或之后不久死亡。这一结论的依据是，瑞典皇家医疗委员会(作为 1961 年委员会调查工作的一部分)、威廉姆斯女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分别咨询的法证专家均认为尸检结果是正确的。独立小组还获得了原始尸检的 X 光片。小组接受 Fleming 先生提供的意见，即病理学家在验尸检查时正确记录了所有负伤，哈马舍尔德的前额没有任何枪伤。

193. 考虑到医疗专家的结论，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关于死亡原因的其他说法，包括哈马舍尔德在坠机前或坠机幸存后被刺杀的说法，缺乏证明价值。现在应该可以认为，而且在我看来是丝毫不容置疑地确信，前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除 Harold Julien 之外的所有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是在坠机后瞬间或短时间内死亡的。联刚行动代理首席安保干事 Julien 因肾功能衰竭并发症于 1961 年 9 月 23 日死亡。如 1961 年调查委员会所认定的，如果他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而不是罗得西亚当局所用的 16 个小时之后被解救，其生还机率会更高。由于对 SE-BDY 机上所有人员的死亡原因做了及时和正确的记录，有关坠机后被刺杀的任何传闻都是不可信的。

3. 当地官员和当局的行为，包括搜索和救援

194. 独立小组认为，两名目击者提供的新资料，即北罗得西亚当局发现飞机残骸的时间早于当地时间 1510 时(其官方陈述中所说的时间)，其证明价值为“中”。

独立小组还认为，关于 Alport 勋爵 1961 年 9 月 18 日当地时间 1400 时到达索尔兹伯里时，即在罗得西亚官方陈述所说时间之前得知坠机一事的资料，其证明价值为“中”。此外，正如 1961 年委员会所指出的，1961 年 9 月 18 日开展的对 SE-BDY 的搜救努力远未达到预期的认真尽职标准。尽管飞机一坠毁，就有人立即报告了当局，而且显然 SE-BDY 没有着陆，并且在邻近地区有 20 多架军用飞机可用，但直到飞机坠毁 15 个小时后、航用晨光时 9 个多小时后才找到飞机残骸。1961 年委员会认为，“有关航空官员之间的联络与合作不足、他们不够主动和尽职、拖延执行既定程序”阻碍了搜救行动。我同意这一看法。除了造成的其他后果，如能早些找到坠机现场，Julien 就有可能存活，这样便能留住亲身经历了这场悲剧、因而可能了解其原因和情况的唯一证人。

195. 虽然有关官员和证人的证词有不一致之处，但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评估，并且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依据这些证词本身就认定官方串通一气拖延搜救，或存在某种其他类型的掩盖行为。因此，尽管搜救行动延迟可能显示出缺乏专业性，令人感到惋惜，但在我看来，似乎不存在阴谋勾结坐视不管，进而一定表明有串通一气或掩盖坠机原因的行为。

七. 建议和结论

A. 建议的依据

196. 在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开展工作后，这一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于 2014 年再次向大会提出。当时，根据提供的新证据，秘书长建议了三种备选办法：任命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评估新证据的证明价值并提出建议；重新开启 1961 年委员会 1961/62 年所做的调查；启动新的调查。与此同时，秘书长还建议，鉴于时间的流逝，应鼓励会员国寻求解密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

197. 大会选择任命独立专家小组来评估新证据的证明价值并提出建议。根据赋予独立小组以及随后赋予我作为知名人士的任务授权，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机构开展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力求确定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事件的真相。在联合国主持下，约谈了新证人，审查了数万页原始记录，进行了法证检验，咨询了专家，并与会员国进行了接触。在联合国主持下，我们执行了一个进程，其间得以排除了某些无确凿证据的说法，集中精力审视那些可真正揭示那天夜晚所发生事情的假设。

198. 但是，事实依然是，提供给联合国的资料不足以就坠机原因得出结论，似乎有可能存在重要的补充资料。尽管秘书长建议会员国考虑解密其拥有的相关记录，迄今尚无报告显示有任何会员国开展了系统性的搜寻和审查，以确定截至 2013 年仍然保密的哪些记录有可能解密。会员国提供了外交和政治领域的多种记录，但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对情报、安全和国防实体的资料几乎都没有解密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如果说有什么资料能向我们更多地揭示坠机原因，这些资料可能就在这些档案里。现在迫切需要可能掌握相关资料的所有会员国全面审查其情

报、安全、国防和其他记录，披露或至少证实存在任何相关材料；如果不存在这种相关材料，应就此做出清晰明确的声明。

199. 联合国没有权力强迫会员国披露文件，因此，它可能已接近或正在接近以建设性方式及时获得有足够证明价值的新资料的权能极限。要想知道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事件的全部真相，现在必须改变责任分配，应由可能掌握相关资料的个别会员国授权启动一个进程，以此审查所有记录。

200. 当然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在维护会员国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真正重新考虑是否可能披露那些几乎是 60 年前的、涉及年代久远的事件和往昔世界的资料。本报告提到的许多会员国就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在中部非洲开展的活动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内部调查，调查结果已经公开。

201. 值得强调的是，我在以上分析中提到了某些特定会员国，因为他们给予了合作，回应了我提出的搜寻资料请求，对此我表示感谢。我向其他一些会员国提出了请求，但没有收到答复。当然有理由认为，它们以及其他会员国仍可能提供更多资料，我同样敦促他们配合回应搜寻资料的请求。

202. 我也曾想过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议 2014 年向大会提出的其他备选方案，即重启 1961/62 年的调查，或启动一项新调查。目前我不建议这样做，因为重启调查或新调查将面临同样的限制，即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要求或迫使会员国查找或披露相关记录。因此，尽管我仍然认为有必要开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以最终查明事实，我认为在此之前会员国必须同意给予合作，全面审查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并进行有意义的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有正当理由继续拒绝披露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以下三项建议。这些建议并不是相互排斥或互不相容的，可以同时落实。

B. 建议

203. 首先，我建议秘书长或其指定的独立人员对本次调查中尚未完成的各个方面采取后续行动。我想指出，有几个问题的调查工作已进入后期阶段，但由于没有时间或资源，以及会员国的合作有限，我一直无法完成调查。仅靠这些问题本身不可能就坠机原因做出结论，但应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涉及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各种说法，如果对其加以评估并完成调查，很可能对坠机原因的假设有证明意义。目前的调查有以下几个尚未完成、但条件已成熟的方面应予以了结：

(a) 力求让那些尚未对我提出的扩大资料搜寻请求做出答复的会员国做出回应；

(b) 寻求获得许可以充分查阅南非可能已找到的关于南非海洋研究所和 Celeste 行动的记录和文件，以便对它们的年代、真实性、保管链、来源和其他相关信息进行独立评估；

(c) 通过联合国档案、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可靠信息来源审查并核实加丹加空军的空中能力、在其控制下的机场或简易机场、为其服役的飞行员、1961年9月10日至20日期间其飞机对联刚行动采取的敌对行动；

(d) 与美国跟进了解(独立小组、联合国和知名人士)提出的未得到答复的问题以及有关 Abram 和 Southall 的服役经历问题的新进展；

(e) 寻找是否存在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塔和 SE-BDY 之间发出和接收的、或被与这一灾难事件有关联的相关方侦听到的通讯，并评估其证明价值；

(f) 继续努力寻找 De Kemoularia 约谈“Beukels”的原始笔记和录音磁带，包括有关“Beukels”、“De Troye”和“Grant”的身份的可能证明或对其进行核实，包括与有关会员国政府进行核实。

204. **第二，我建议要求每个有关会员国指定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相关资料。**我认为要执行这一进程，需要任命一名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接触机密文件许可和资源。此人需要全面审查相关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其中是否载有可揭示 SE-BDY 坠毁原因和情况的信息，之后在严格保密条件下将结果摘要呈送秘书长或其任命的人。收到这些资料后，秘书长或其任命的人将与每个有关的会员国进行双边联络，会员国有机会要求对具体资料进行校订，之后向大会报告结果。如果找到了相关记录，但出于安全或其他原因不能披露，那么，承认存在此类记录仍然是对历史记录的一项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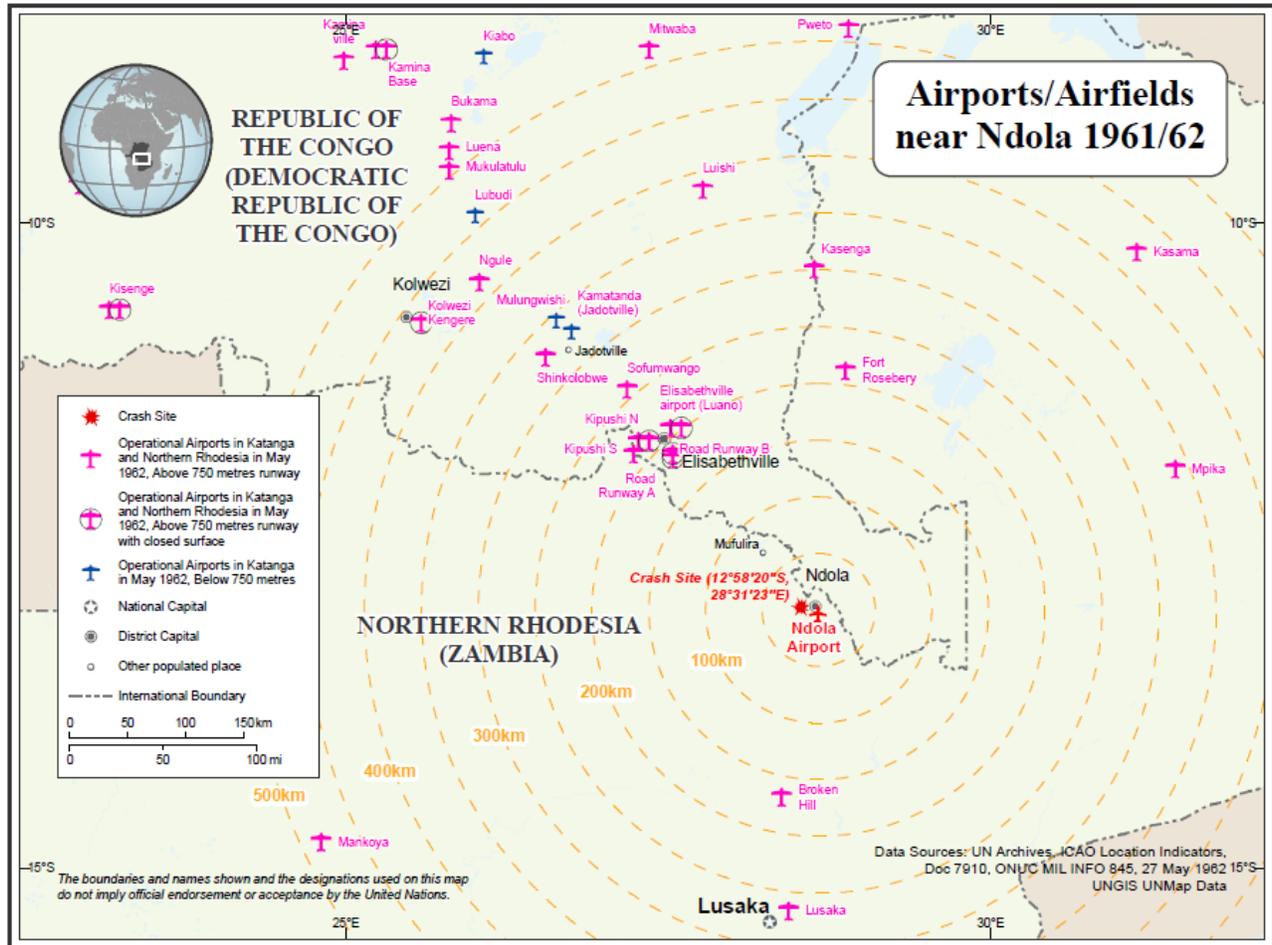
205. **第三，我建议联合国审查自己的具体记录和档案，确定可否解密。**虽然这最终要由秘书长决定，而且这一行动可能涉及到资源问题，我认为从保持透明的角度讲，对有关此事的某些联合国记录和档案进行审查以解密和开放查阅，是一种有益的做法。这可包括知名人士的记录、我的第一项建议所指的联刚行动的记录以及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所有记录，确定是否可以解密。这不仅将为会员国树立榜样，也有助于确定在会员国档案的哪些地方可能找到更多相关资料。关于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记录，据我了解，该机构完成工作后将其记录转移给了联合国，并有一项明确谅解，即它不反对公布材料。

206. 我想指出，如能授权具体人员持续接收和整理新资料以便向秘书长转递，对这一事项的处理将大有助益，但这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建议。我认为，一种有益的做法是，让获得授权的人员以本报告的结论为指导，不时地评估任何新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对导致这一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的了解，以便使秘书长能随时向大会通报这方面的事态进展。

207. 最后，我再次强调，必须继续协作努力寻求真相，必须履行我们对受害者家属、联合国组织和真实陈述历史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在了解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的全面真相方面取得了进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会员国积极参与搜寻资料，使我们能填补事实陈述方面仍然存在的空白；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步骤，这样才能使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使我们对本国组织执行公务时在 SE-BDY 坠机中不幸罹难者的记忆得以安放。

附件





Map No. 4571.2 UNITED NATIONS August 2017

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ction (formerly Cartographic Section)